炎黄春秋

第1期
2008年

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朱良：随胡耀邦访问欧洲四国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王亚卓事件始末

元曲主旋律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录

卷首语

1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 ……本刊编辑部

特稿

3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

求实篇

10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邵　建

17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十九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政治理念评述 ……秦　晖

一家言

25 关于撰写《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一书的几点说明……黄道奇

28 从周恩来让座说起
——纪念周总理逝世32周年 ……梁　衡

人物志

31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李卫雨

35 项南扶贫记……谷　峰

往事录

39 胡耀邦外交活动的创新
——记总书记1986年访问英、德、法、意四国 ……朱　良

44 《光明日报》“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陈　英

47 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徐慰曾

亲历记

49 在上海遥望昆明
——六十年前震惊上海的两次民主浪潮 ……袁　鹰

53 王亚卓事件始末……邢　卓

59 不堪回首的那一天……黄　鹂

故纸堆

61 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白介夫日记摘录

怀人篇

65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
——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吴南生

68 深切缅怀黄正清同志……李屺阳

71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刘道新

古镜台

74 元曲主旋律……王克明

编读窗

79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吴昭谦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本期：　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

● 本刊编辑部

新年已至，人们总是对新的一年抱着种种期待。2008 年，是中国人抱有更大期待的一年。

大家期待中国更加民主。中共十七大报告承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果这些都逐步变成现实，将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大家期待社会更加公平。十七大承诺“通过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最为重要的保证。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不公平是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用公共权力实行不平等交易。十七大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承诺，自然是通过建设民主制度并且用民主制度限制公共权力的承诺。

大家期待更加开放。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8 年将在中国举行，我们将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远方的朋友，体育竞赛之台将同时演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政治交流的大戏，世界文明将与中国发生更深的相互影响。

人们的种种期待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渐渐变成现实。

2008 年是中国改革的第 30 个年头。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2006 年和 1978 年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GNP）增加了约 60 倍。在世界处于第四位。和前三名美、日、德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从 1978 年到 2006 年，中国人口增加了 3.6 亿，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了 41 倍，在世界排列名次向前提高了 50 位。

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中国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这一转变的进步意义十分重大。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为了搞到 1 千万吨钢，曾倾全国之力，搞得人仰马翻，闹了个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 1978 年的 3178 万吨，增长到 2005 年的 35239 万吨。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虽然有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穷人也能吃饱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生活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当然也有人否定改革，说改革的方向错了、道路错了。每个人身边的进步都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对这些说法做出了回答：“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一回答代表了民心民意。

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也面临

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够公正。

这里说的社会不够公正，就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够对称。从道理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相当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往往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在政府的批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强力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这种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行政权力，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体系和不健全的市场体系的不良结合造就了使人遗憾的“病态社会”。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今中国，上层建筑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而经济基础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以为这正是我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结果。

社会不公正还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失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进步。前面说的改革成就，就有资本的大作用。但是资本还有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另一面。近几年来的新闻报道中，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时有出现，资本和权力私下结盟共同压榨劳动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里提出了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消极面有过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批判基本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而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我们要驾驭它，利用资本有利的一面，防止它不利的一面。过去，我们要求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也要在国民收入的初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这些还不足以驾驭资本，因为还缺乏制度保证。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很容易占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和规范资本的行为，社会问题会日益严重。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被二十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在当今中国，除了要依靠民主来制衡公共权力，防止权力偏差以外，对资本的制衡也需要民主制度。

问题又回到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众所周知，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毫无疑问，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政治改革长期拖拖拉拉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到时候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积极、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本刊对新一年的期待。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 田纪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经进行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伟大的三十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的篇章的三十年。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 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21 万亿人民币，比 1980 年增长 10.5 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 3.93 万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32.4 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 17604 亿美元，比 1980 年增长 45.2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59 元，比 1980 年增长 4.3 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587 元，比 1980 年增长 3.8 倍。我国十三亿人民，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膳食结构大大改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年的时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步战略目标——由饥饿到温饱、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贫穷落后、商品匮乏、定量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

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简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起步、怎样逐步展开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改革开放的条件准备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使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 1978 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

田纪云与胡耀邦

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谁敢越雷池一步?! 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革命干部还在蒙受不白之冤，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依靠谁去搞改革开放?!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政治上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倡导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在组织上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积极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晚年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下面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妥当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号召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后来把‘四人

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如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就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

胡耀邦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们党最讲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大多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比如：党政职责分开，党委不对口设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门；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村委会由村民直选，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等等，都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农村改革打头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

田纪云与万里

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

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

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 年 1 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 1980 年 3 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

田纪云与李先念

1983 年 12 月，田纪云（前左二）在深圳考察工作，前左一为深圳市委书记梁湘

业的活力。1978 年 10 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 年 1 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 14 项政策、措施，并选择 100 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 100 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 年 7 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

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 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

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人民的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进、改革工作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下转16页）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 邵 建

一

1925年10月10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注1]

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引同上)

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引同上)

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1920年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五卅’,鼓荡起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当时,正在奉行合作的两个政党,老牌的国民党和年幼的共产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帝。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注2]作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自觉游离于它之外的。还是1922年,胡适在《努力》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就表明他和这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上海和陈独秀的争执不妨视为胡适的率性),如果我们返观胡适那个时期的文字,他没有避讳帝国主义

这个词，他反对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舆论形势把反帝视为时代任务的中心。也就是说，外交问题不是当时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内政。针对当时流行的“弱国无外交”，胡适则指出“内乱之国无外交”。因为“外交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和内政有密切关系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九个月换五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

胡适的话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这一天，上海举行反日大游行，参加者有160个团体，人数达五万。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样的连锁大游行，显然不是自发，而是政治组织的。对此，胡适在《努力》“这一周”中以《外交与内政》为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果然一个不爱管政治的民族，一听得外交问题，也都感奋兴起了！”然而，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对于这种热情的表示，不但不发生乐观，只能发生感喟。"我们老实承认，我们对于今日外交问题，实在鼓不起热心来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们只希望国人从这种失败的外交状况上格外感觉早早澄清内政的迫切。”[注3]

胡适为什么在反帝上“鼓不起热心”？难道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帝国主义，基于它的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是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来建立自己的经济、政治霸权。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经基本告一段落。随后签署的《辛丑条约》，不排除其中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由于该条约由美英主导，它们注重的是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因此，条约最终只是提出巨额赔款，并没有割地诉求。就赔款言，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并明确希望以庚款兴学，清政府响应，遂有了后来的清华学堂乃至清华大学。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即日起，中国应付英国的庚款，英政府

胡 适

准备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依然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应当不坏。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现领土危机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随后，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试图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到自己名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结果“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五四运动即因此而起。当然，中国不是“巴黎和会”唯一的失败者，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他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这就导致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他的失望，并把希望转向了列宁）。然而，转机在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其中议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按照胡适对这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会议确不是为

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注4] 这个机会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不妨看看国民政府时代的两个蒋博士的回忆。一个蒋博士是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蒋廷黻，他有机会随同中国代表与会，从而目睹了一些会议上的情形，这是他对会议的表述：

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的调整税率。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

蒋博士虽然不满威尔逊的承诺并未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根本兑现，但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注5]

另一个蒋博士是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这次他受国民党的支持，以非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华盛顿会议”。蒋梦麟说：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

和胡适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所不同，蒋还说：

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枉。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注6]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也就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一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边高呼“收回青岛”，“还我山东权利”。所有这些，如果无果于“巴黎和会”，那么这次却在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中有了果。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承认，美国从中出了力。美国哪怕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比如要压住日本，不能让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坐大；但，客观上，美国的做法有利于中国；同时，这里还不能排除美国本身（尤其是民间）对中国的同情。所以，在《国际的中国》中，胡适接着上文说：“会议的结果虽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稍知当时情形的人，都该承认当日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学者，舆论家，并不是替‘资本帝国主义’做走狗的。”[注7]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其反帝所指，首先就是美、英（包括日）。陈独秀1922年10月4日写《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这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具体对象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同一天，陈独秀另有一文，题目是《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批评北京的议员林宗孟和非议员胡适等到美国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谈宪法。陈独秀敬告这些议员学者，“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而且直接把前此结束的华盛顿会议称之为“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注8]

今天读胡适的《国际的中国》，简直就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文章缘起于陈独秀在告全国宣言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他们所作出的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赞成第一项，反对第二项。他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胡适这样阐释此问题：

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

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在胡适看来，投资国要想被投资国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胡适承认，十年以前（即辛亥以前）列强对中国是想走第一条路。而现在，经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9]

可以看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基本思路。国际帝国主义基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唯一关注的是国内政治。退一步，国际问题即使存在，但"攘外必先安内"，内的问题不解决，外才成为"外患"。

胡陈就中国问题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但，可以指出，在那个时代，舆论优势不在胡适方而在陈独秀方。即使把当时的问题放在今天，估计支持陈独秀的要远大于认同胡适的。帝国主义是中国20世纪的梦魇，1840—1900，已经构成国人难以擦抹的民族记忆。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记忆的裂口依然如此深大。胡适上面那句话放在今天依然生效，这几年来，只要一碰到外交问题，这个民族马上就"感奋兴起"。

二

"帝国主义"一词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作为一种话语，帝国主义不自本土而自苏俄。它一旦进入本土，就为当时两大政党所共奉。这两大政党都具有群众动员的性质，经由其广泛

陈独秀

宣传，这一词汇登堂入室，一直深入到国人的头脑与血液，以迄于今。

1921年下半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派代表参加苏联举行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张国焘，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记述："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笔者注：实际是同一天。但，此会后来展期，地点亦改在莫斯科）。"这次会议的意义，与会后的张国焘表述得很清楚：

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任务既明，便进入宣传鼓动。还是张国焘的叙述：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

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注10]

插：张国焘回国后，向陈独秀们作了汇报，后者“欣然接受”，便发布了一个有关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也正是这份宣言，导致胡适写出了《国际的中国》。张国焘的记忆真好！他说胡适指反帝为“海外奇谈”，这也正是胡适在该文中的措辞，只是误了一个字。胡适原本是说这份宣言对形势的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莫斯科会议”是和“华盛顿会议”对着干的，甚至连日期都要提前抢一天。这是20世纪美苏对立在国际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现。当“华盛顿会议”客观上作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某些议决时，中国本土却掀起了反帝反美的声浪。当然，必须指出，“反帝国主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联。这次反华盛顿的会议，国民党也派代表（张秋白）参加。以上张国焘说反帝是由“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这个“们”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当时，苏联的策略是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拉住年轻的张国焘们，另一只手则伸向势力更大的国民党。它甚至能够把反帝内容直接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中。比如，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是民族主义，这一条过去是排满。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却按照苏联的意图作了新解释。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拉罕就国民党一大致信苏联领导人，谈及民族主义时，说：“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意思，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这“两个方面”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华民族举国反帝即反美，另一是蒙古从中国国土上分离出去，然而这正是苏联的意图。对此，加拉罕志得意满：“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注11]

于是，国民党自一大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捩转：反帝。有学者研究国民党一大时指出：“如此明确的反帝主张，在孙先生是第一次。”虽然反帝就是反美，“但是在十几天以前，孙先生刚刚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做了既强硬又仍然抱着希望的谈话，这谈话，据鲍罗廷笔记，是很不高兴的。”[注12] 鲍不高兴的原因，是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依违不定，还对美国抱存希望。当然，在苏联经援和军援的重诺下，孙中山对美国的希望最终破灭。还是这个鲍罗廷，在他后来向国内所作的《关于国民党》的汇报书中，明确指出：“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已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注13]

在陈独秀和孙中山联手打造中国大地上的反帝热潮时，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当然不合时宜，或者说，是时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时宜之间，谁更多地拥有历史正确，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难题。不过，就当时而言，如果胡适仅仅代表他自己，那么，无论陈独秀还是孙中山，其力量都远远不是一个人。因此，正如上文所说，这样一个比例，不仅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走向，也决定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然而，胡适的主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文章发表三个月后，在越飞写给国内的绝密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对胡适的某种回应：“世界帝国主义始终企图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更加残酷地奴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近来甚嚣尘上的关于使中国“国际化”和“对中国财政进行国际监督”的议论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14] 其中“国际化”和财政在胡文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胡适的“国际化”在陈独秀那里直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针对陈文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七条控诉（包括东交民巷公使团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外币流通问题、财政权操于总税务司问题、关税问题等），胡适在文章最后做了这样的回答：

这七项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

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注15]

概言之，请民族主义让位于民主主义，用民主制度解决民族问题，这就是《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基本的思想表述。

胡适虽然反对陈独秀的反帝，但他并不会知道中国的反帝背后有一只苏联的手。那么，苏联为什么热衷于中国的反帝？这个问题，别说当时反帝的陈独秀孙中山不知道，也别说"反反帝"的胡适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我们，欲知其见不得人的秘密，也得等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的解密与开放。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在苏联向西欧扩张的意图失败后，它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它需要把东方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以改变自己在全世界的孤立地位。于是，中国首当其冲。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是近邻，是它和日本的一个缓冲空间，而且在战略上，"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注16]可以体味一下什么叫"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要点燃反帝的冲天大火，是不是要格外费一番心思。

这心思首先是从学生身上开始。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来抵制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与这种依靠美国的方针对立，我们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作思想斗争。"[注17]由此可见，苏联策划的中国反帝运动，首要目标就是反美。

由学生而政党，由政党而政府，这是苏联运作中国的一道"草蛇灰线"。不过，这个政府不是执政的北京政府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苏方为什么对这个政府感兴趣，请看他们的自白：

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注18]

把孙中山的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以所谓民族革命，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苏联向远东伸出带着长毛的"咸湿手"的意图，如此赤裸，又如此真实。但，长期以来，它的形象，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

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帝被苏联先在地定义为反美、反英、反日，它自己反而蝉蜕了这个对它来说更加名副其实的恶号。即以美苏而论，苏俄从中国攫去了多大的版图，而美国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侵占过。1900年以来，除了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危机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二十一条"是历史后遗，即使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斡旋下，亦于1922年基本化解。然而，戏剧性的是，正是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脱离中国从而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仅此而观，赤白之间，谁更帝国主义？

让历史记住1922！

这一年，中国在领土上回归了山东（因为美国），又丢失了蒙古（因为苏联）。也是这一年，英国决定退还中国庚款，苏联在中国策划反帝运动。应该说，是"华盛顿会议"使苏联人产生恐慌。1922年，在谈及中国的工作问题时，苏联人的目标很明确："华盛顿会议就在援助中国的幌子下，推行奴役中国的政策"，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是……揭穿某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的虚伪友谊。"[注19]苏联人成功了，从1922年起，美国几乎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案：1923年，蒋廷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当我离美返国时，我仔细

回想沙费尔德教授的授课内容。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注20] 蒋是留美学生，受美帝国主义毒害不浅，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的危害之在。1924年，陈独秀有《留美学生》文曰：“美国限制移民律，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们应该愤恨美国，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注21]

立此存照。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注1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96-97页，学林出版社，2006。

注2 转引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104页，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

注3 胡适《这一周·65》，《胡适文集》卷3，第469-470页。

注4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集》卷3，第383-384页。

注5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87页，岳麓书社，2003。

注6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63页，岳麓书社，2000。

注7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集》卷3，第384页。

注8 陈独秀《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14页，三联书店，1984。

注9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集》卷3，第384-385页。

注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47、193、195页，东方出版社，2004。

注11“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以下该书简称《联共》），第412、4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注12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107页，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

注13“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联共》（1），第568页。

注14“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联共》（1），第219页。

注15 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集》卷3，第386页。

注16“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联共》（1），第112页。

注17“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联共》（1），第53-54页。

注18“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联共》（1），第63页。

注19“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联共》（2），第405-406页。

注20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82页，岳麓书社，2003。

注21 陈独秀《留美学生》，《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56页，三联书店，1984。

（上接9页）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见1985年3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

（责任编辑 杜 晋 吴 思）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政治理念评述

● 秦 晖

马恩讲“专政”：内战状态，只能以暴抗暴

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在当时欧洲各国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也主张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者的镇压，但是所谓他倡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怎么回事，却值得研究。

例如《共产党宣言》主张阶级斗争，也有暴力革命的色彩。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语焉不详，其中不但没有“专政”之说，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众所周知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自由”。因此这句话显然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是矛盾的。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从早期马克思文稿中对“完成的个人”的论述，《宣言》中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关注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自由个性”列为人类发展三阶段（“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与“自由个性”）的终极目标都可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专政”，而“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

而且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属于西方思想史上所谓的“积极自由”传统，不像“消极自由”论者那样仅仅把自由看作是不强制，但“不仅仅反对”当然不是不反对。据说“积极自由论者”得势后容易强制别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但就马克思而言他从来没有“得势”过，他终身争取自由、反对强制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现在所知，在提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之前，当1848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月18日上台执政，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月20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康普豪森本人是个银行家，他想建立的制度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愤愤，正如列宁后来所说：“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幻想’而痛斥了他们。”显然，在“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没有“专

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

——但在和平时期呢?正式的而非“临时的”国家机构呢?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很清楚:“陶醉于立宪”的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换言之,即便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截然不同的。后来流行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之说,显然与马克思的这个说法相左。

“专政”与“布朗基思想”

人们知道:“专政”一词作为拉丁文出现于古罗马,而在近代作为政治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人热衷于以“复兴”古罗马的东西来对抗“中世纪”,圣茹斯特的一句名言是:“革命者都应该成为罗马人!”著名的雅各宾党人专政就体现了这种“罗马概念”的影响。

后来近代工人运动兴起,“专政”的概念同样最先出现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具体地即布朗基派最先提出这个说法。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连载《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中提到1848年法国革命激化成为内战时,无产阶级“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做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思想“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该书还肯定了法国人(按:当时法国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即布朗基派)在革命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这是迄今所知马克思最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在这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与“布朗基思想”视为一体,这是有特定背景的:不仅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的首创权确实属于布朗基派,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马克思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流亡伦敦的布朗基派法侨组织正在密切合作,甚至已经在秘密协商成立联合组织。而通过以暴抗暴来寻求无产阶级解放正是双方联合的思想基础。

就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写作期间,1850年4月,伦敦法侨布朗基派流亡组织的代表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哈尼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三方七人经过谈判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准备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由维利希(共盟中“冒险主义集团”首领,号称“德侨中的布朗基”)起草的该协议第一条就声称:“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革命。”与《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到的一样,这里“专政”是与“不断革命”相联系的,而在当时语境下所谓“革命”就是指暴力革命。这个非常激进的协议虽非马、恩所写,而且带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但马、恩是同意并签了字的。

然而该“协会”实际并未成立,因为协议墨迹未干,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了。协议起草者、“德侨中的布朗基”维利希急于“革命”,与反对冒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闹掰而同布朗基派法侨组织联手。马、恩与哈尼遂于当年10月正式通知维利希等人,宣布废除上述协议,约他们前来“当面烧毁上述文件”。此后他们与布朗基派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专政”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也凸显了。

恩格斯对“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的批判

原来马克思赞同布朗基的“革命专政”论,主要是赞同它不畏镇压、以暴抗暴的立场。然而布朗基“革命专政”的另一个含义,即依靠“先进的少数”来强制“落后的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反对的。这后一含义意味着不仅“革命中”要用暴力对抗镇压者的暴力,而且“革命后”的和平条件下也要以“专政”来对付“落后者”。这就是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马、恩对此十分反感。恩格斯后来指出:“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设想为少数革命者的Handstreich(起义),于是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就是自然的;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起义的少数人的专政,而且他们在起义以前就已经服从了一个或几个优秀分子的专政。”

晚年的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布朗基派依靠“密谋学派的精神”和“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他们相信“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能

够以铁腕手段夺权和掌权，并使人民“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然而成为讽刺的是：正是由布朗基派作为多数派的巴黎公社，其实践却是对布朗基主义的最有力的颠覆：因为她完全反严格集权之道而行之，推动法国各地建立自治的公社并“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而“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些旧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过去每次革命后都“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而现在“巴黎公社却一举废除了它”！

如下所述，恩格斯批判“优秀者专政”的这些重要思想后来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于批判民粹派的“人民专制”说。

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何以很少谈“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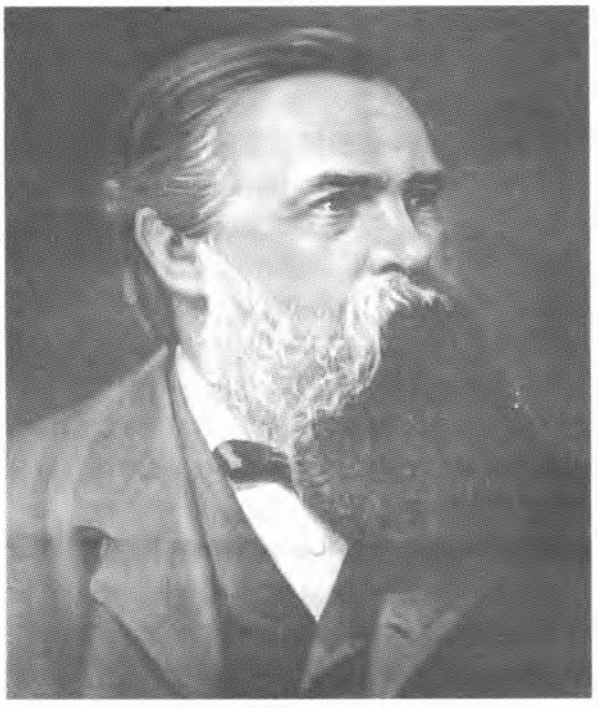
而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但从1850年他称赞布朗基派的“专政”口号和一度与布朗基派签署过含有“专政”提法的协议后，他私下的确几次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作为现存制度（“资本主义”）与未来新制度间的一个必经的“过渡”环节，是他本人的创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是在私人通信（如今天屡被征引的《致魏德迈》）、读书摘要手稿（如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摘要）、不发表的同仁意见书（如《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别人通讯稿中转述的他的话（如《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总之都不是他自己发表出来的。而1852年后，即便在私人通信中，马克思也有很长时间未提这一概念。1980年代苏联著名的“左派异见分子”、“反对斯大林的列宁主义者”麦德维杰夫曾解释说这是因为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学去了。笔者以为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主要的原因应当是：马克思讲的“专政”都与战争有关，而当时处在和平时期，没有现实的“专政”问题，历史上的“专政”也并非他那时的关注点。

同时还有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1859年12月卡尔·福格特发表《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小册子，以“知情人爆料”的形式大肆诽谤马克思，把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描绘得如同黑道帮会的密谋，其中就屡屡提到马克思想搞“专政”。马克思为此专门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以辩诬和反击，强调自己与维利希、布朗基这类密谋冒险家和潜在的专制者截然不同。因此他在一段时间内也似乎是有意回避“专政”这个敏感词的。

迪克推多：“专政”就是临时取消共和

不但如此，人们注意到：终其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的各个工人运动组织，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直到国际内他们直接指导较多的几个大党，如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建立并参与其纲领起草的英国“土地与劳动同盟”、早先拉萨尔影响很大但后来恩格斯几乎是其唯一理论权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老大哥”，以及马克思两个女婿拉法格和龙格所在、拉法格为创建人、而且马克思还曾口授党纲的法国工人党，在以上述所有这些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字中、包括像《共产党宣言》、1847年和1850年两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8年《革命政党章程》、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英国的《土地与劳动同盟纲领》、德国的《哥达纲领》及《爱尔福



恩格斯

特纲领》、法国的《哈佛尔纲领》这类纲领性文件，乃至其他一般文件中，都从未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这些文件或为马、恩所写，或者至少也受到他们的强烈影响。

在所有马、恩积极参与过的组织中，只有前述那个胎死腹中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那份秘密协议有过这一提法，但这个协议恰恰既非马、恩起草，也未公布生效，而且很快就被马、恩宣布废除。

有人说，这是因为“专政”的提法刺耳，影响一般公众包括工人群众的认同。笔者以为运动的实践活动家的确有这种考虑，例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拒绝在《哥达纲领》中加入“专政”字样恐怕就是这样想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显然并不很在意“刺耳”与否，但他为什么对倍倍尔等人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并无强烈反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

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共和末期的独裁官逐渐不守规矩，到屋大维时干脆改称元首（prlnceps），罗马进入帝制时代，迪克推多之称便不再存在。

显然，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因此它与“专制”（autocracy）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进入帝制罗马及其后的中世纪与拜占庭时代，“专制”成了常规，dictator一词便极罕见了。直到近代的暴力革命中，这个名词才又在原来意义上被使用，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体制是常被提到的两个典型。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列宁后来一再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从该名词的原意讲，他并没有说错。

第三它是一种与紧急状态（通常是战争）相联系的临时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种正常的执政方式，这一点它与“专制”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只讲无产阶级“专政”而从不讲无产阶级专制，之所以只在谈到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内战”时讲“专政”，马恩时代他们指导下的各左派组织之所以都没有把“专政”一说列入纲领性文件乃至一般文件（马克思偶有异议却从无强烈反应），就是因为这种临时手段就像罗马共和背景下的小插曲，无关共和宏旨。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是在古罗马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词的”。其实在列宁以前这也是人们通常的理解。

在马克思的时代，欧陆多数国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健全，普选权尚未实现，财产资格制普遍存在，无产阶级仍缺乏结社、组党、竞选等民主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时“代议制是以

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础的。"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的代议制无从表达穷人的意愿，下层民众没有自己的"代议士"，而他们在议会外的运动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87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卡芬雅克作为第二共和的捍卫者曾经抵制波拿巴政变和第二帝国，梯也尔则是结束第二帝国的第三共和缔造者，应当说他们都是当时典型的共和派，但却都残酷地镇压过"草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因此也会产生"专政"状态。这种以暴抗暴的思想也的确给后来人造成很大影响。

巴黎公社是"专政"吗？

如前所述，1852年后马克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谈论"专政"问题。直到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鉴于巴黎公社被暴力镇压的教训，马克思又一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以暴抗暴的思想。在后来的苏联式国家意识形态中，这本著作通常被认为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经典的文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实际上通篇并未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甚至在当时发表的文本中连"专政"一词也找不到（只有《法兰西内战》不发表的"二稿"中有一处提到"专政"，但却不是指巴黎公社，而是指"把议会纯粹当作嘲弄对象的"第二帝国。马克思称之为"僧权专政"）。但几个月后，美国一家英文报纸曾经发表一篇《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通讯，其中以第三人称方式报道马克思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巴黎公社时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作序时，则明确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引起了一些歧义。

把马恩视同一体的考茨基后来解释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思想时，一方面说："就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就本义来讲，它还表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dictator）。个人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经常的国家机关，而是一个出于当时情况需要的临时状态。"如下所述，考茨基这样解释确实是符合专政一词的词源"本义"的。这个解释显然是要批评列宁把专政永久化。但是考茨基紧接着却又说，马克思讲的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因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样本正是建立在多党制民主的基础上。这又是在批评列宁的"专政"破坏民主。但是这两种批评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说马克思讲的"专政"不是就"本义"而言，它就不必是"临时状态"；而如果是就"本义"而言，巴黎公社怎么可能是既"专政"又"民主"的呢？所以后来麦德维杰夫就不认同考茨基的解读，他认为马克思讲"专政"始终是就本义而言的，即在以暴抗暴过程中的一种临时性军事独裁。

但按这个定义，巴黎公社能否叫"专政"是很难说的。考茨基作为恩格斯的学生把马恩视同一体可以理解，马恩的思想也的确是基本一致的。但作为两个都很杰出的思想者，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完全正常。恩格斯后来谈巴黎公社时关注的是她的战争措施，而马克思在写《法兰西内战》时关注的是后来被称为"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那些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法兰西内战》本身不但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而且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也完全不同，它尽管也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却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65个革命党人当选，反对派则有21人，其中15人是著名的反动派，6个甘必大派激进共和主义者。65个革命党人代表了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尽管他们彼此斗争很剧烈，却没有一派对其他派行使专政"。我们知道这所谓65个革命党人主要有三派，即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他们都各自有公开的俱乐部（雏形政党）并进行政治竞争。马克思对公社的许多做法有批评（主要是没有乘胜进攻凡尔赛、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但从未对这种多元政体持异议。

没有常备军的自治城市与"自由联邦"

不但如此，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而只保留民兵——请注意：马克思讲的决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废除常备军的思想早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就有端倪，但19世纪的工人运动，尤其是马克思这一支，把这种思想大为提升，使其在“国际”及其各党的纲领性话语中屡见不鲜。1869年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纲领、1875年的《哥达纲领》、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巴黎代表大会决议都提出了废除常备军的诉求。“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虽然为打内战很快重建并大力扩充、强化军队，但当时苏俄《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然而此后这个“不久的将来”被推迟到无限遥远。如果巴黎公社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那苏俄岂不是从来没有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美国源自殖民地时代民兵抗英传统的公民持枪权反倒更近于“无产阶级专政”了？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中央集权制：“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必须严格限定并建立确实的问责制。而且这些职能似乎并不包括镇压：“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马克思甚至主张“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

这也是“革命者都应该成为罗马人”的表现之一：古代的罗马共和国就是城邦与城邦联盟，中世纪晚期的自治市和城市共和国乃至法国大革命后就有的“巴黎公社”都属于这个传统。1871年的公社与1789年相比，市民自治倾向更突出、与中央集权的冲突更厉害。公社不承认凡尔赛法国国民议会的权威，却并不想取而代之。公社从未声称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府，而只是自我定位为巴黎市民的自治机构。公社存在期间她向法国各城市发出的呼吁也只是号召他们都起来自治，从未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领导。显然，公社与凡尔赛之间除了其他矛盾（如阶级矛盾）外，城市自治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也很明显。而马、恩谈到公社这方面的经验时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正如恩格斯所说：主张革命专政的布朗基要求建立集权政府，而巴黎公社却违反其意愿，要搞一个各城市高度自治的“自由的联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反对布朗基而高度赞赏公社的。

因此，《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即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话应该如何解释的确是个问题。后来苏联人强调“摧毁”后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而且新旧之别似乎只是“机器”的主人和镇压对象倒了个个：过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则用来镇压资产阶级。而镇压功能则是一样的，甚至“新机器”的镇压力量似乎还应当更强大！然而至少在军队问题上，这样的说法与马克思的说法根本相左。按马克思的说法，特别是他以巴黎公社为例表达的说法，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常备军，无产阶级是根本不需要常备军的！这样的体制与其说接近于“先军政治加古拉格群岛”式的体制，毋宁说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列宁后来把它称为“半国家”，即介乎于有政府无政府间的一种状态，是语出有因的。

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抗暴权，承认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关于“恩格斯转变”与此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

显然，巴黎公社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竞争性多党民主共和制，以及以民兵、直接民主与城市自治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后面这种半乌托邦式的体制在后世能够存在的最为近似的案例恐怕要算今日的瑞士，而苏联比美国距离这个模式更远得多。

当然，在内战状态下巴黎公社也实行了某些军法统治即“专政”手段（如拘押人质、公安委员

会等)。可以说它既有民主制度，也有临时性的“专政”措施，马、恩的说法各自侧重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而造出“民主专政”之说。在这方面，对马恩理解更准确的应该是麦德维杰夫，而不是考茨基。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赞成暴力革命，但从未把“暴力革命”绝对化。在巴黎公社失败不久的1872年，马克思就曾设想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这类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变革。恩格斯本来谈“专政”比马克思更多，但他晚年在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完全合法化后即日益重视和平过渡，社民党竞选取得重大进展后，恩格斯更认为无产阶级党派可能通过民主程序执政，而不必通过内战了，在逝世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他甚至开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些想法对于后来各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人放弃暴力革命而从事议会政治，提供了思想支持。

当然，那时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那么看重“语录”，社会党人搞议会民主并非根据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并非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主义者”。张全景最近在声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文章中力称晚年恩格斯并未放弃“革命权”。其实何止恩格斯，自从美国独立宣言以来凡是承认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则上坚持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像甘地那样把非暴力原则绝对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以暴力对付暴力。后来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立即于1933年8月召开巴黎代表会议，并通过决议全力反对法西斯，“直至武装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抗击法西斯主义暴力”。而共产国际倒是在近两年后的“七大”上才通过类似决议的。战前欧洲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34年维也纳二月起义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直到二战以后的社会党国际，也仍然是一方面支持议会民主，另一方面肯定(如在拉丁美洲)以暴力反抗独裁的合理性。

暴力革命必然意味着“革命后的专政”吗？

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

其实，后来社会民主党的“防御性暴力”主张不仅与“恩格斯转变”后的说法类似，“转变”前恩格斯也早有类似的观点。例如，早在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草案（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一稿）中，就批评了“制造革命”的说法，“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就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这里讲的很清楚：无产阶级搞暴力革命并非必然，而是“如果”被推向”才会发生。因此，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但如果万一专制复归，无产阶级仍有权以暴抗暴。所以，说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沿袭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张都是夸大其词。应该说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显然，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当然，现代社会党对马克思学说的重大修正是明显的，它突出表现为经济上改变了消灭市场经济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目标，而主要采用民主国家干预、公共福利、二次分配的手段来实现社会平等。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这种修正不对，因为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变化已经远远有甚于此。更何况，这种修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在1917年各社会民主党与列宁分手时，他们的经济纲领以今天的眼光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极左”的。

总之，自由与民主本是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但当时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所以马恩主张暴力革命。而“专政”提法源自法国布朗基派，马恩接受这一提法，意指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专政不可避免”即来自“内战不可避免”的预设。但与战争无关的布朗基派“优秀分子专政”主张，马恩是一贯反对的。马恩也从未设想和平时期的“专政”。对于内战中的巴黎公社，恩格斯肯定其战时“专政”措施，但马克思论述公社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时从未用“专政”一词，所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也并不包含建立反向镇压机器的意思，而是强调与后来苏联模式相反的一些原则。19世纪末民权普及，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正常参与民主博弈，不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专政”概念因而淡出。但无论恩格斯还是后来的社会党人都并没有变成甘地式的绝对非暴力主义者，而宪政民主原则也并不必须以甘地原则为前提。因此这一转变主要是形势转变，而就“防御性暴力”的思想而言，既不存在“恩格斯转变”，也不存在“社会党背叛”。——这就是我们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政治理念演变的结论。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关于撰写《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一书的几点说明

● 黄道奇

编者按：现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好像少了，但是热心于马克思的人仍然是有的，黄道奇同志就是一个。黄道奇同志从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和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来，现在已年逾八十，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下决心读欧洲的许多名著，并写出厚厚的三本读书笔记（《晚年读书札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第三集）》），现在综合编成一书名曰《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刻苦探索马克思的原意，在不少问题上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读书大不易，包括马克思的原著和西方许多颇是生僻的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尤难。但是黄道奇同志知难而进，终得战果。此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将黄道奇同志关于写成此书的"几点说明"公布在这里，以彰其锲而不舍的精神。

一、本书是从我出版过的三本读书笔记，即《晚年读书札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第三集）》挑选、节略编成。书名仍取《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

二、文章不是依照写作时间的次序排列，除第一篇《读史纵横杂议》外，基本上是按所叙历史年代的次序排列的。这样作有利于比较容易找到欧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发展的轨迹。

三、我读历史是为了弄清西方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从而努力按照西方文化传统去解读马、恩著作的原意，开始时并不十分自觉，后来感到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不能责怪汉语翻译家们，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实在是中西方的辞义有时相隔太远，这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而产生的，特别在哲学领域里，尤以德文为甚。遇到这些问题，本书都作了些诠释。

四、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人类只能不断地、一步一步地认识自然和人类自己组成的社会。这个论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也应当作为历史科学来对待，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来发展的。他们在世时正值欧洲资产阶级用最无情的手段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时代，他们的愤怒代表了工人阶级强烈的要求，这只能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在实践中去发展。有些论断不论过时或错误都应予以放弃。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人，是实践中的人。假若你看到了马克思有错误就否定他，那只是你的思想里早就仍然有一种神，或为一尊偶像所占据，你只能依赖它而生活，那就离开马克思太远了。

五、有人从劳动创造价值入手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特定经济领域的实用经济学），其实这个命题早在17世纪的威廉·配弟就提出来了，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加以完成的，李嘉图早就料到这一论断将被人们所误解，马克思也一样。他在写《资本论》第一章时，多次重写，只怕别人

写的博士论文里看得出来。当然，我们非常尊重黑格尔对哲学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本书里都作了记录。

七、过去论马克思思想时强调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则可以感受到其直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说的影响更大，《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到人的异化的论述，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他的研究生涯大部分时间都被撰写《资本论》占据了，异化理论就是这个巨大工程的准备和发端。这些我过去不知道，谢谢学者们文章的指点，晚年才弄清。

八、社会主义思潮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是对“平等”的内涵的深化，它从来是代表社会的下层弱势群体的利益。19世纪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比较完善地表明社会主义的意义，这本笔记都作了相应的记录。

九、文艺复兴是欧洲的大事，是中世纪以后的第一次启蒙，先进人物要求以人的地位代替神的地位。即恢复人性反对神权专制，回到希腊民主制度；自17世纪以来，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以霍布士、洛克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发其端，在艰难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以后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他们分别为发展自然科学、人文学、政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为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权力制衡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19世纪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这些思想中走过来的，我的第二本笔记涉猎到一些著作，为压缩篇幅，在这本书中没有全部重印。

十、欧洲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主要是希腊哲学、科学和它的城邦制度，马克思精通希腊哲学，对城邦自由人联合的体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借用了希腊的“自由人”（公民）和“联合体”（国家、城邦共和体制）而命名的。我看过几本欧洲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关于希腊历史的著作，都不及我国学者顾准写得深刻。我将顾准有关希腊的著作写成笔记，遂成为我的第三本笔记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以及溯源而上的米利都等学派的自然哲学做了几篇笔记，编入本书的只能撷其要点了。

十一、我对马克思关于“消

难以理解，我认为他已经讲述得十分通俗了。但是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反对。有人提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马克思虚构的，其实这是一种人们每天在思维时常用的抽象法，“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其共同点，也就是说，所有不同的具体劳动中，抽出其中的共同的质，称“抽象劳动”。譬如，每个人体都各不相同，他们的共同点，即共同质就是普遍称之曰“人”——抽象的人。在这本书中作出了应有的回答。

六、一般书籍和文章把黑格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影响的时间，估计得长了一些，其实大学生马克思就开始摆脱黑格尔的思想束缚，这可从他

灭私有制”的问题开始最为关心，有学者认为汉译“消灭”一词，应译为“扬弃”为准确，这是正确的。当然所谓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是“自由人”必备的条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著作中显得越来越谨慎，以后提出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恩格斯承认1848年的形势他们估计错了，这与当时工人的迫切要求和激烈情绪有关。恩格斯以当时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的地位而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这种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以后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有着它的长期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下，在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中，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不同程度地迅速增涨。这种渐变的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欢迎的，与他们对暴力和和平的两种方式的论断相吻合。

十二、后来我越来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专心攻读了，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恩格斯为此两书所写的《导言》，使我突然清醒了，沉浸在欢乐和痛苦之中。马克思把他首先反对、后来热情支持的巴黎公社革命，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范例；而政权组成人员却很少是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成员，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共同执政的体制。这里所讲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共同执政”是从古希腊创立的“轮番为治”衍化为“共和”制度而来，即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就是说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种民主共和制，很多人只理解为政权建立后的对反动派实行镇压的职能一面，这个词在党内遭到很多人的误解乃至反对，恩格斯在《导言》中作了严厉的批评，可见当时的误解就不少了，何况我们?！但早在三十多年前顾准就读懂了它，实在难能可贵，我自己也感到羞愧。既然如此，现在不大用这个词是有道理的。

十三、欧洲人常将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对的，他们的学说是共同创造的。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据马克思亲属和亲密朋友撰写的马克思传记，描写了他们曾因有分歧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几乎都要第三人努力调解才能罢休。我相信这些描述是真实的，因为见事角度不尽相同当然会产生一些分歧，很正常，如果没有分歧就不正常了。人文科学是一种历史科学，都具有时代的特征与局限。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还生活了近十三年，欧洲的经济、政治有了许多变化，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它，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重视通过工人运动合法斗争进入社会主义，俄国人因不理解欧洲政治、经济已经逐渐在变化的情况而发生了误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分歧，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澄清。我的笔记对恩格斯晚年巨大贡献作了记录，当然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贡献远不止这些。

十四、我说过，老年人读历史是痛苦的事，大概历尽沧桑，人的神经变得有些脆弱，而历史血泪斑斑，老人经受不了这种刺激，因而老泪纵横，无限惆怅；只是看的多了，习以为常，变得有些麻木。

十五、最近有人著书，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们犯的错误都是由于马克思的误导，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马克思。使我忽然想起了前苏联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国有个时期出版的《马恩选集》也没有把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收进去，前本书是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起始时写的，非常重要；后一篇是恩格斯最后的一篇重要著作。那么这是谁误导的呢?

十六、感谢我国一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同志看得起我这个工作，给以帮助，尤其是得到陈敏之同志的有力支持而得以终篇，我是十分幸运的。

我是不是还有点时间继续读书、写笔记，我无法回答了。

2007年10月

（责任编辑 吴 思）

从周恩来让座说起

——纪念周总理逝世32周年

● 梁 衡

2006年9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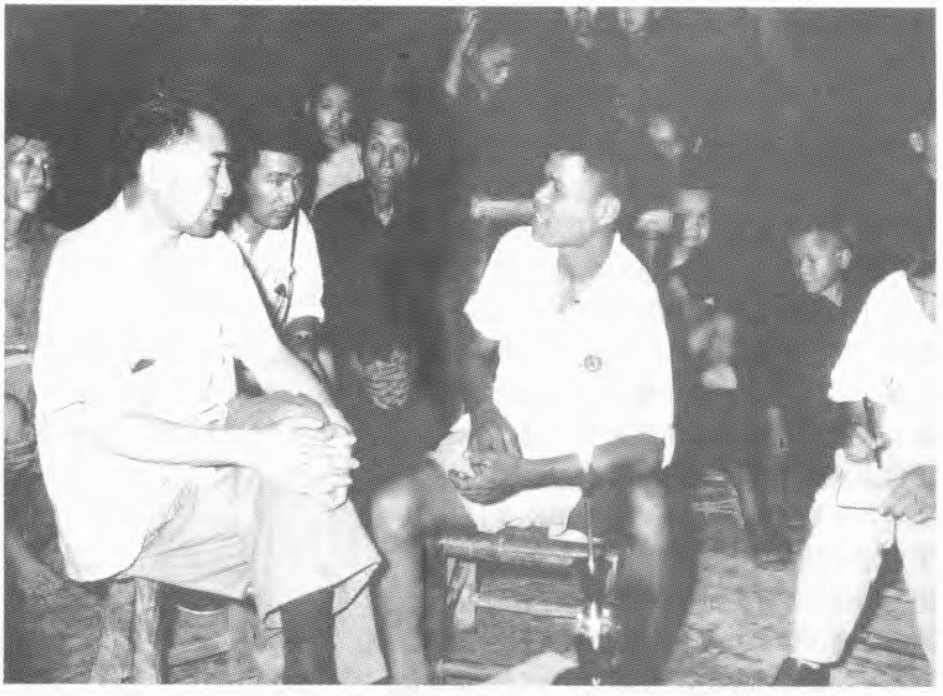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一个县，广东新会县来作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坐，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坐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面面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

分。以公心论坐，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坐？何敢争坐？以私心论坐，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驾机出逃自我爆炸。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周总理和农民周汉生在田头对坐聊天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坐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

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坐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上接34页）的代理人是不能轻易放过他的。

"回北京可以，但得保证不翻案。"

"我何罪之有，为什么不能翻案？"

1972年5月底，这伙人为了应付军委领导让李聚奎回北京的指示，把李聚奎一家从龙里搬到了重庆，但还继续对他进行管制，直到1973年3月，才在军委领导的催促下，让他回到北京来治病。

1976年秋，"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的冤案终于逐步得到彻底平反，他回到了过去亲自创办的后勤学院任政委。

1986年，李聚奎虽年事已高，仍壮心不已，带病写下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财富。80岁那一年，李聚奎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代表军委撰文纪念李聚奎上将，他们用"功高德也高，楷模昭后人"的评价概括了这位战将的一生。

（作者系李聚奎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

● 李卫雨

1970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聚奎及全家被林彪反党集团遣送到贵州龙里隔离审查。图为李聚奎在龙里住房后山坡上的留影

李聚奎生于 1904 年，是湖南涟源人。

红军时期，李聚奎迎着大苦大险勇往直前，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屡建战功；打“AB 团”时，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个伪证；西路军被打散后，他是红军将领中千里乞讨找党中央的一位。抗战时期，敌人四面围困，艰苦到了极点，他坚定、顽强，机智、勇敢地率部与敌斗争，战绩辉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更趋高深，创造了古北口保卫战等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在军调部工作时，他坚持原则，与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任务；他实践了我军后勤工作从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创办后勤学院、建立石油工业部和发展我军现代化后勤工作又立新功。他在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是一员战将，为此，1933 年荣获二级红星奖章，1951 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 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 7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1982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1—1988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1987 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李聚奎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而他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

李聚奎上将 1958 年 3 月到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 8 年之久。8 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

他提出勤俭办后勤的思路，结合国家的财力、物力开展军事后勤工作；

他从未来战争出发，参与领导和组建全军后勤基地建设；

他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

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聚奎的确是“彭黄路线”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彭黄不但从心里敬重，更由于他也是彭黄那种品行的人。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

后勤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的品行却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时，原总后领导人出于勤俭办后勤的思想，处理军队经济问题时，都要全面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同时，对于总后与各总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尊重和支持的。但邱会作一上台，不顾国情实际，就要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要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对此是不赞成的，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这些事还没了结，一件棘手的事又落在李聚奎身上，就是总后政治部保卫部门又一次接到群众举报，邱会作再次出现骚扰女同志问题。情况报告给李聚奎，李聚奎十分痛心。总后党委过去曾就同类问题多次对邱会作进行过批评教育，但邱终不思悔改，又一次败坏了党的高级干部形象。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李聚奎根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组织总后党委会对邱的腐化思想进行了批评。

邱会作越来越体会到李聚奎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企图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扩充小集团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真相显露。

邱会作采用的手段的确是很“高明”的。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则一个人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独自决定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不同意邱会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时，邱便在会上会下、人前人后地讲：“你李聚奎反对我可以，反对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

三年困难时期，林彪指示邱会作向国家多要一些粮食储备。邱会作在组织计划中马上加大了预算比例。李聚奎站出来反对说：“人民群众也没多少粮食，部队以紧算为好！”邱把话传到林彪耳中，林马上不悦。

又一次，林彪指示部队团队要骡马化。邱便在全军大办马场，要无限扩展，只讲形式不讲效果，造成连年亏损。李聚奎到基层调查回来，指出过滥兴建马场不切合实际，不仅占地太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还造成当地军民关系紧张。特别是由于人力物力跟不上，生产出的马匹有很大比例质量差，达不到军马标准，只能廉价处理，造成很大浪费；同时提出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办马场，把培育军马的工作落到实处。邱会作指示总后军马部计划多向外国买军马，李聚奎则认为我们只要进口少量良种马的种马，认真做好繁殖培育工作，是可以做好这项工作的，没必要花费国家大量外汇去购买大批外国马，军马部不能变成买马部。这次，邱又按自己的需要，选择了李的几句话传给了林彪。

再一次，林彪一伙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业务要给政治让路”等一套错误做法。李聚奎很不以为然，他说：“见什么影？一夜就把《毛选》学好了？我就不信，这里有假象。”离开业务讲政治，政治就是空的。”这些话更是邱会作向林彪“告状”的好材料。

……

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了：“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李聚奎天然的品行带来的必然结果，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收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军委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才知道，这次将李聚奎调出总后，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以此判定总后广大干部群众是否是“革命派”。不久，

他们便将李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身上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看着处于身心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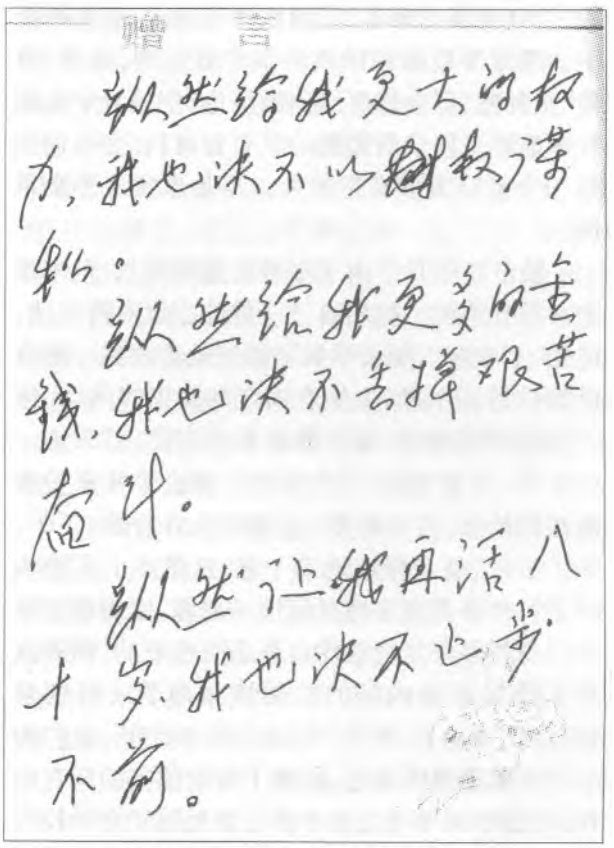
邱会作曾对专案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结论。"但为了蒙骗群众，他们还要做些表面文章，妄图让李聚奎自己承认他们编造、强加给他的罪名。为了给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压力，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他实施关押，其间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们全部愣住。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李聚奎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诬陷，更不诬陷他人，还要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他的理念就是他在1966年9月11日就总后给他的大字报问题写给总政萧华主任并总政党委的信里的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1970年4月，无法使李聚奎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省龙里县属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有一个总后的单位）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

当时专案人员通知李聚奎这是执行1号命令，被押解去的地点保密。一路先火车后汽车，最后的一段路翻山越岭，窄到卡车只能有一侧轮子在土路上走，另一侧车轮则在田地里的土垄上颠着走。到目的地后李聚奎下车环视四周良久，突发一语："这里是贵州龙里吧！"押解人员大惊，以为有人通风报信，急令李聚奎交代何以得知。李聚奎将军道："长征时我率部在此地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通过。"押解人员听后哑然。

李聚奎所指为1935年4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然后先分兵伪装主力，吸引敌人兵力，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搅得蒋介石晕头转向。随即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兵临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东抵龙里，吓得蒋介石一面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预备好马、小轿，准备逃跑。4月7日晚，红军中革军委向部队发出命令："我野战军决定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到4月9日止，中革军委机关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30里宽的地段


赠言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

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

纵然让我再活八十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1984年李聚奎在80岁时写的自勉

上急速南下，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红军一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南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克数县，进入敌兵力已变薄弱的云南。红军因此甩开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使蒋介石要将红军一举歼灭的妄想落空。李聚奎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率红一师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掩护中革军委和后面的部队安全通过。

时隔35年，李将军故地重"游"，回到了当年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地方。

在龙里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李聚奎被剥夺了言论、行动、通讯等一切自由。专案组继续对李聚奎在政治上实施重压，专案组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每一次都要把李聚奎关押到另一处房间里，连续几天不许回家，继续用逼供信的方法让李聚奎承认那些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李聚奎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李聚奎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李聚奎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李聚奎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摔折了。李聚奎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到，这份"自传"是林彪、邱会作要给他做结论、把他置于死地并牵连更多群众所需要的重要假材料之一，而他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不是事实决不会承认。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李聚奎并没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贯的态度对待生活：坚强、不虚度。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先读一段毛泽东选集，找不到更多的书籍，就重读一些政治、历史文献，因为保卫干事会经常来检查他在做什么，只有这类书是他们允许看的。下午，来了报纸，他会仔细地看一遍，这基本上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情况的惟一来源，因为就连孩子们与外界来往的信件也都是受检查的，稍有点有关政局形势内容的信都被扣押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三四个月里，他们为了对李聚奎封锁消息，扣押了寄给他家的所有信件。直到李聚奎在龙里中学上学的孩子在学校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后回来告诉全家，李聚奎才得知了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后来时间长了，保卫干事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屋后的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因保养电线被砍下的树枝，回家劈成小劈柴，这下还真解决了家里炉子生火的大问题。

为了磨损李聚奎的意志，兵站有关人员在专案组的授意下除了在政治上给他施加压力外，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他出难题、人为地制造困难。而李聚奎和他的夫人王惠颖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了，他们对政治迫害顽强抗争，对各种生活困难积极克服、从容处置，并鼓励和带领孩子们自己动手，多想办法，勇敢地面对现实。王惠颖更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据理力争，不断为全家人争取活下去的基本权利。她想到，李聚奎目前处境恶劣，没有任何权力，而自己可以用"没有政治问题"的身份与他们斗争，尽力保护家人，增强全家人坚持下去的信心。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更加坚强、勇敢，学会了在逆境中的思考、生活和斗争。一家人就这样在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后来，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时得知，邱会作一伙准备把李聚奎定为所谓"彭黄漏网分子"、假党员等，并作"清除出党，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判处10年徒刑，送贵南马场劳动改造"的处理。

在困境中意外回到35年前处于危境且发生转折的地方，这件事本身让人感到是一种巧合，而李聚奎以后的经历却把这个巧合变成了传奇。在李聚奎及家人被关押于龙里的第二年，即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反党集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又一次转折。"文化大革命"笼罩下的政局开始出现变化，李聚奎冤案的平反也从此见到了曙光。李聚奎在龙里这个中国偏僻的苗族、布依族小山寨，相隔36年，获得了两次从困境中转向光明的经历。后来李将军的一位老战友还以此跟他开过玩笑，说："老李，你到了龙里是'龙归故里'，福气就会来，你是属龙的嘛。"

林彪、邱会作一伙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想重返北京，查清问题，殊不知"四人帮"和林彪、邱会作一伙残存（下转30页）

项南扶贫记

● 谷 峰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项南同志任一机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 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项南在福建期间，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结合福建的实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短短的几年，一向落后的福建省开始走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局面。

1989 年 1 月，项南卸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人民对他赞口不绝。人们说，项南主政福建的五年，是全省进步最快、变化最大、省委决策最深入人心的五年。项南是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坦诚、务实、刚直、清廉的省委书记。中央对项南主持福建工作作出较高评价："福建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形势很好。"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胡启立评价说："在项南同志的主持下，福建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华侨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项南卸任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当时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可是他又毅然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筹建我国第一个民间扶贫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一无资金、二无办公机构和办公人员、三无办公场所的情况下，筹建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项老怀着对贫困地区人民的深情厚意，迎着困难前进。

那些日子，项南东奔西跑，拜访知名人士，讲述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很快，原国家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答应出任扶贫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答应出任扶贫基金会的名誉副会长。原农业部长林乎加、原国家经委副主任李人俊同意出任扶贫基金会顾问。国务院各部委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原驻国外部分使节及社会各界部分知名人士，纷纷报名加入扶贫基金会担任理事，愿为中国的扶贫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德高望重的项老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

1989 年 3 月 1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及扶贫基金会全体理事出席了会议。李先念宣布了基金会工作的三项原则：一是扶贫基金会需要捐款，但绝不低三下四，到处"化缘"；二是赞助的钱必须用于扶贫，绝对不许挪作他用；三是扶贫工作中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否则贫困地区永远不能改变贫困面貌。各级政府向贫困地区拨的扶贫款，不能因基金会的成立而不拨或少拨。项南把基金会的工作方针归纳为"三字经"："只服务，不赢利，只帮助，不代替。多造血，不输液，多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立，要致富，靠科技。"基金会的宗旨是：辅助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和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基金会将竭诚为一切关怀、支持中国扶贫事业的国内外政府、机关、团体、企业和热心人士提供良好的服务。中国扶贫基金会一方面筹集扶贫资金和物资；一方面进行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广泛地同世界各地进行联系，推动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对基金会的成立都作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关注。

项南主持扶贫基金会期间，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宣传扶贫宗旨及扶贫方式。前些年，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多次专访项南；基金会举办的重大活动，各媒体多次进行报道；基金会还印发多种宣传品向国内外散发，扩大中国基金会的影响。受项南的委托，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与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评选活动，每年一届共举办了七届，评出全国"扶贫状元"70 名、"扶贫贡献奖

项南(右一)陪同胡耀邦在福建考察工作

获得者"80名。颁奖仪式十分隆重,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向全国"扶贫状元"颁发证书,新闻媒体广为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向国内外筹集扶贫基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项南及全体理事及办事人员的共同努力,筹集的资金逐年增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不论捐赠多少都一视同仁,真诚感谢,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形象。

项南及基金会的同事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深深感到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不但需要投入资金,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项南这一想法,一次与原来的老战友、原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省人大主任韩培信交谈时,一拍即合。之后,江苏派出经济发达地区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一批干部,赴经济比较落后的陕西部分地区挂职工作,在技术、人才方面给予支持;陕西派出一批基层干部赴苏南地区挂职锻炼,熟悉经济工作,增进开放意识,获取各方信息,产生了良好的效益。这一成功经验,经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支持与推广,很快发展到全国25个省区,双方交流干部达一万多名。在"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上,项南在发言中指出:东西部干部交流,有以下几点实践经验值得重视。一,对口支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重点放在发展乡镇企业上面;二,对口支援,要把重点放在提供信息、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人才引进上面;三,对口支援,要建立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础上面,不能一方受益,一方受损,支持应该是平等的、互惠的,这样的支持才有生命力,才能长期合作下去。项南将这一发言撰写成《东西互助,共同发展》文稿,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发表,还配发了题为"扶贫开发的一项创举"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中国扶贫基金会创造了扶贫开发的一个新模式。

项南和基金会同事在探讨中发现,上面发放的扶贫基金,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落实到贫困户。为此,扶贫基金会从1995年起就把"扶贫到户"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基金会在各地举办过多次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班,聘请有致富经验的人,给贫困户传播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项南提出"扶贫到户",要靠各地扶贫组织操办,要找准适当载体,如银行、供销社、公司加农户、孟加拉方式等,做到扶贫基金能到户,能收回,有载体,有市场。扶贫中要看实际能力,量力而行,不要强人所难。项南甚至提出可以考虑在国外华人集中的城市成立"扶贫之友协会"。这一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可以向捐赠者颁发"扶贫之友"证书,并定期向捐赠者说明资金到户的情况,及时反馈扶贫效果,增加透明度。实践证明,"扶贫到户"是扶贫工作的一个新方式。

项南主持扶贫基金会工作时已是古稀之年,仍拖着不健康的身体,多次与基金会的同志深入老少边穷地区,访贫问苦,出谋划策。几年中,他们先后深入冀、晋、豫、陕、甘、宁、辽、黑、闽、赣等十几个省、区的贫困山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脱贫致富献计献策。

1990年,项南与副会长何载赴陕、豫贫困山区访贫问苦。他们不带秘书随员,轻车简从,艰苦备尝。两位老人参加完一个座谈会后,项南提议,二人"私自出走",自掏腰包买了硬席火车票,一路奔波到了秦巴山区。两人日夜兼程,走遍了商南、丹凤、商州、山阳县的穷乡僻野访贫问苦,仔

细考察当地的贫困状况和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在会见乡村干部时，项南提出了一些脱贫致富的建议："你们植被条件好，地上地下资源有优势，你们的山林要比甘肃、河北太行山区强得多。山里的核桃、板栗是一个优势，应该深加工出售商品，不能老是出售廉价原料，把钱让人家挣去。全县每年吃国家返销粮7000万斤，如果有十万人在外边务工，就可以大大减轻吃返销粮的压力。"项南还对县乡干部说："办工业要经过很好的科学论证，不可盲目上马，要慎重地、有计划地发展县办工业。你们上项目，一定要立足于当地资源。"

离开商洛地区，两位老人又风尘仆仆地奔到安康地区。他们上陡坡、进桑田、访农户、下车间，直接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接触。

1992年项南与何载两位古稀之龄的基金会会长，赴延安考察陕北的贫困状况与扶贫工作。他们发现，延安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把自然资源开发与扶贫结合起来，延安地区很快就会脱贫致富，成为全国富裕地区之一。项南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延安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外国的企业家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以前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们的基础设施太差，飞机不通航，铁路未修通，信息不灵。现在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利用外资的条件成熟了，这是加速延安地区开发的好时机，千万不能再耽误了。"

项、何两位会长这次也去考察了榆林地区。榆林是革命老区，大部分县乡又是贫困地区。项南提醒当地干部："要进一步加强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商品意识。榆林地区要发展得快，就应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大胆地搞好外引内联，把国内发达地区和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过来。"项南还建议榆林有计划发展一些乡镇企业，利用资源搞一些大中型项目，以尽快使榆林全区富裕起来。

此次榆林之行，项、何两位会长还考察了由扶贫基金会于1991年启动的"60万亩沙地改水地"的项目。原来，此前扶贫基金会有关同志曾向项南建议，陕北榆林农民搞沙土改水田的尝试值得重视。扶贫基金会工作会议讨论此事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比较稳定的农业增产措施，将对固林、固沙起到长久作用。经过专家论证，认为可行。据测算，每亩地需要投资260元。经扶贫基金会牵线搭桥，国家计委和有关企业十分重视。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金熙英与陕西省政府联系、协调，并做了改造方案。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改造工程进展顺利，效益很快显现出来。项南在1994年初所作的《民间扶贫开发的几点情况》中指出："这个项目启动三年之后，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项目区内人均增加粮食85公斤，已有15000户、730000人脱贫。这项工程不仅开始为陕北开发煤、气、石油的职工提供蔬菜肉蛋等副食品，而且还为该地区六个县51个乡镇、70万人创造安家乐业的条件，到1994年春，已完成近40万亩，投资2亿多元。后来一些年中，榆林沙地改水田工程扩展到60万亩，不少农民由此脱贫致富。"

位于太行山麓的河北省阜平县，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当时的军区司令员就是聂荣臻元帅。然而，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阜平依然贫困。晚年的聂帅对阜平的脱贫致富时时挂在心间，他将项南请到家中，含泪握着项南的手动情地说："阜平人民不脱贫，我死不

项南（左）与本文作者

瞑目啊！”项南郑重地说：“请聂帅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帮助阜平脱贫致富。”之后，项南多次抱病去阜平考察，和基金会的理事、工作人员，深入深山农户访贫问苦，发现问题，探讨脱贫致富的门路。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项南说：“阜平县人民在战争年代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在解放后四十多年的今天仍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感到很难过。我认为，山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干部，县级领导干部要保持相对稳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要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县主要领导干部不能六年换五次，要有五年、十年干到底的决心，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才行。”“精神状态实质上是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我认为，共产党人对人生价值应该这样看，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与困难作斗争，最大的快乐就是克服困难，为人民谋利益。”项老和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点子，想办法，提出阜平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即“一四一”：开展一项“温饱工程”，抓住四条龙，搞一个开发区。从阜平回京后，项南等人通过种种渠道为阜平找项目、找技术、找资金。他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香港、台湾、福建、江苏的企业家和专家到阜平落实扶贫开发项目。在项南的指导下，阜平先后输出劳务6000多人，一个劳务就使一户脱贫，劳务输出已成为阜平的一个支柱产业。

项南主持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外国企业家、海外华侨对中国扶贫事业的捐赠，无论数目多少，都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日本国际文化协会会长板井久之先生，早期捐赠1000美元，有人认为此人太寒酸。项南却说，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只要扶贫，不论数目多少，我们都欢迎，都支持。项南亲自出面接待这位日本朋友并表示感谢。后来，板井先生年复一年组织发动日本朋友开展捐赠活动，捐助了河北省五个县，使2000多名失学儿童入学；还捐款为阜平县兴建了一所小学、一个培训中心。

1991年春，项南等人赴福建泉州市安溪县，为印尼老华侨李尚大捐资二三千万元兴建的学校落成剪彩。李尚大为人豪爽，重情重义，其家族在海外实力雄厚，他本人对故土始终怀有一片深情。项南与李尚大在北京有过接触，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此次相见，项南对李尚大说，你身在海外，依然心系故乡，听说现在已经将家族的实业交给下一代管理，一心关注家乡的扶贫和教育事业，令人敬佩！美国埃索（中国）石油公司曾经捐资160万美元，赠给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三家慈善机构运作。一年后，该公司又捐出65万美元，委托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兴办小学。日本某和平财团捐款500万元，日本三广医疗株式会社捐赠B超仪10台，美国李家欢夫妇捐赠衣物8000余件，台湾某圣母医院院长（意大利籍）吕道南捐赠医疗仪器折合人民币220万元，香港汇富融资集团林家恩捐款10万元，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驻华使节筹资6万元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项南与赵朴初，一个是中共党员，一个是佛教居士，两人信仰不同，多年来却保持着深厚友谊，传为佳话。

项南与赵朴初的友谊始于1954年。当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他们二位作为安徽省选出的代表，同时来京开会又编在一个小组。通过日常接触和会议发言，双方渐渐熟悉，彼此之间印象极佳。在以后多年的交往中，二人性情相投，兴趣相近，结成了深厚友谊。赵朴初先生毕生热心慈善事业，对自己的家乡安徽太湖县的贫困状况十分挂念。1997年春，他向项南吐露了忧心之事，希望设法筹集一些扶贫款项，帮助家乡改变贫困状况。项南此时已辞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职务，仅挂个“首席顾问”头衔，不过问具体事务。但他深深理解年迈的赵朴初先生的家乡情怀，尽最大努力设法予以帮助。不久，安徽省扶贫协会为太湖县筹到1036万元扶贫款，项南亲笔写信告之朴老。不久，项南因心脏病不幸去世，耄耋老人不胜悲伤，竟在不长的时间内为项南大哭三场。追悼会上，他悲伤地看着老友的遗容，禁不住老泪纵横。“我要送你一首诗”。老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大约半年之后，因病住院的朴老怀着深厚的感情，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五言绝句《项南同志哀辞》。他以俊逸典雅的楷书写在宣纸上，送到项南夫人汪去馨手中。

项南的正直、真诚、坦荡无私，给他所有的朋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

（作者系新华社资深记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胡耀邦外交活动的创新

——记总书记1986年访问英、德、法、意四国

● 朱 良

1986年6月8日至23日，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问了英国、联邦德国（简称西德）、法国和意大利四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正式访问西欧。1986年前后是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很好的时期。

胡耀邦为对外政策重大调整的努力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缅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讲到"他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针对"三个世界"、一条线战略和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他在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等四个原则，并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予以阐述，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革命决不能输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加快了说服有些党，搞革命依靠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作了自我批评；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1980年邀请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访华，开始了同几十个被称为修正主义并中断了十多年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胡耀邦提出了党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后来被写入了党章。1977年开始，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八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曾希望同中共建立关系，当时我党均未予以置理。1981年2月，由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应邀访华，回国后三个月，密特朗赢得了总统选举，后来又以总统身份访华。1984年5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前总理勃兰特应邀访华，胡耀邦在欢迎讲话中赞扬勃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南北对话的努力，指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方针。胡耀邦同访华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深谈，结交了很多朋友，不少人邀请他回访。密特朗特别是勃兰特访华后，全世界主要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就陆续同中共建立了友好关系。

出访"名义"、陪同人员及访问次序

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四国的领导人和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都邀请胡耀邦总书记去访问。胡耀邦是以"总书记"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去出访？有的同志担心，如果以"总书记"名义，可能不会受到国宾礼遇，有的国家元首、总理可能不好出面接待。但是胡耀邦坚持用"总书记"的名义。实际上当时的顾虑是多余的，后来四国都是以最高规格接待。

总书记的陪同人员共6人，他们是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费孝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联部、外交部的负责同

1986 年 6 月，胡耀邦出访英、德、法、意四国。6 月 9 日在伦敦英国外交部广场出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欢迎仪式。

志、总书记特别助理，以及驻有关国家大使。

决定费孝通作为总书记出访西欧四国的主要陪同人员，这是恢复了三十年前的做法。1957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典，副团长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成员还包括郭沫若、茅盾（沈雁冰）等知名人士。

由于有些国家除国家领导人邀请外，还有在野党邀请，日程的安排比较微妙。英国撒切尔首相 1984 年 12 月访华签署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就邀请胡耀邦访英，1985 年 9 月又发来正式邀请并确定了时间，因此就把英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主人方面还安排了女王、三位保守党、工党前首相宴请或会见。访问的第二站是西德。勃兰特是前总理，又是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到机场迎接总书记一行，然后陪车去参加科尔总理的欢迎仪式。勃兰特除举行大范围会谈，设午宴欢迎，还到我驻德使馆进行小范围会谈，并赶到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北威州参加州长劳举行的欢迎宴会。第三站法国，当时是两党‘共处’政府，总统密特朗属社会党，总理希拉克属保卫共和联盟。希拉克既以巴黎市长名义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并举行会谈，又以总理名义宴请胡耀邦。他后来担任了 12 年总统。法国共产党也发出过邀请，但当时处境困难，胡耀邦偕少数人去法共中央本部会见了总书记和法共机关工作人员。第四站是意大利，克拉克西总理当时政治上遇到了麻烦，日程中有将近一天时间由意大利共产党安排活动。

从政治上和节约费用考虑，这次出访特别强调出访随行工作人员要精干，人数要尽量控制。连胡耀邦在内，访英为 39 人，访德和访法为 40 人，访意为 41 人。

关于出访的几个指导思想

这次出访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胡耀邦和陪同人员开了 11 个半天的准备会议，除了研究出访国家的形势、如何发展两国关系，逐个讨论了讲话稿、宴会稿、会谈内容和答新闻记者的口径，讨论中还提出了几个指导思想，强调外事工作也要创新、改革。在出访期间和结束访问回国后，又几次开会总结了这次访问。胡耀邦强调了以下精神。

（1）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国家作一个好的二三十分钟简明扼要的讲话，也可以当场回答问题，使外国领导人、各界人士和舆论界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有所了解，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减少疑虑，从而增强同我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心。每个讲话突出一个重点，有针对性，有说服力，不讲套话，要有点文采，少用共产党专用的一些术语。

（2）过去从苏联学来的那种举行二十多人的

大型会谈可以搞，但是效果一般。要真正谈点问题，了解点情况，真正交点朋友，促进两国友好，就要多安排一些同各国领导人小型的两三人参加的深入交谈。因为是由领导人面对面谈，没有本国有不同意见的人在场，没有拘束，又不讲套话，谈话的深度和引起对方重视的程度就不一样。要多学习周恩来总理同外宾谈话的艺术。

（3）同对方谈经济贸易问题要实事求是。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出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对方高规格接待，乱开经济合作的支票，吊别人胃口，最后不能兑现，影响很坏。要告诉对方，哪些事现在可以办，哪些事现在办不到；我们方面存在什么困难，对方应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这样使对方看到你是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注：这次在意大利就对菲亚特汽车厂董事长阿涅利说："本着友好的感情，坦率告诉阁下，中国对小轿车的需要只能逐步增加，几年内想把合作生产小轿车的规模搞得很大有困难"）。

（4）要善于通过西方国家的电视等舆论工具介绍我们的观点和中国的形象。不要怕新闻记者提怪问题。出访前，法国方面曾试探过在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密特朗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同志有些顾虑，怕总书记遇到难堪或受到冷遇，没有同意法方建议。总书记到了法国后，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应该充分通过法国的舆论工具面向法国广大电视观众做工作，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因此他直接与密特朗商量，密特朗很高兴，于是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结果有二百多记者参加，谈了80分钟。两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配合得也不错。这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是总书记在西欧四国几次记者招待会最成功的一次。以后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就逐渐成了我国外交活动中的一个习惯做法。

（5）要注意改变欧洲人对共产党人形象的成见。这次到英国时，听到有的英国人说：共产党总书记的"脸孔是红的"，意思是没有"人情味"。在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时，有一群女中学生坐在草坪上玩，总书记走过去，坐在这些女学生中间，亲切地与她们交谈，引起了新闻记者的惊讶，这是日程安排中没有的。在参观牛津大学时，93岁的原保守党首相麦克米伦校长，在宴会结束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和行走时，总书记搀扶了他一下，表示了对老人的尊敬。这些小事被英国舆论注意到了，撒切尔夫人也知道了。英国报纸说，英国人包括女王在内都欢迎这位坦率、讲实话、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原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脸孔并不是"红"的。

在四国访问中四次重要讲话

出国前邓小平同志在看了四次讲话的送审稿后批了：好，没有意见。

四次讲话中最重要的是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第一次演讲，由英国前工党领袖、前首相卡拉汉主持。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西欧各国对我们还很不了解。胡耀邦讲话的题目叫做《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讲话指出："对有些西方世界的朋友来说，中国似乎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神秘国家"。"中国究竟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我愿意告诉各位，本世纪以至于下个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而不致中断。抓住了这条线索，就掌握了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讲话强调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会改变的，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三个基本点。讲话中比较新颖的一段话是国防与建设的关系。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央文件中也讲过，但是公开讲得这样全面、透彻还没有过，外国人很关注。

在英国的这次讲话，把我们党的内外政策都讲清楚了，讲话不仅是面对英国，实际是面对整个西欧和世界。西方新闻舆论界反映，从这个讲话中找到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概念，而又为专家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的新的内容。

第二个重要讲话是向德国工商大会作的《中国谋求同欧洲发展长期经济合作》，主要是阐述中国的经济政策，如何使中国同联邦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1986年时，我国还处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几年来我们实际使用外汇只有200亿美元多一点。从1984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有些过热，因此改革步伐稍微放慢

了一点，基本建设规模有些收缩，有些西欧人士担心中国的改革是不是遇到了阻力？政策是不是会变？针对这个问题，胡耀邦在讲话中介绍了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详细谈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外国朋友对这次讲话印象很深的话就是："中国已经打开了的大门，永远不会再关上。如果说我们的开放政策还会'变'，那只会越变越完善，越变失误越少；越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与交流。"胡耀邦在讲话中坦率地提出四条同西德发展经济合作的想法，最后一条是：要开拓多种合作方式，欢迎西欧国家的企业家到中国包括到省、市、自治区投资，兴办合资企业、合作生产，也欢迎独资办厂，不仅兴办第三产业设施，更欢迎来中国开发自然资源和从事制造行业。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在30年前欧洲人觉得很新鲜。

第三次重要讲话是在法国密特朗总统欢迎晚宴上的讲话，主要谈欧洲的联合，也可以说是世界多极化问题。讲话中列举了中法两国在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当代最根本的问题上的许多共同点。讲话指出：一个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欧洲，将对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第四次重要讲话是在意大利共产党罗马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意共当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共产党。意共作为邀请的东道主之一，除安排纳塔总书记等会谈、举行午宴外，还安排了有意共罗马省委各级干部400人参加的集会，胡耀邦讲了三个问题：（一）中意两党对马克思主义都采取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善于做到：既能坚持基本原理，又能摈弃某些过时的或者被实践证明为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个别原理，而代之以新的原理。（二）两党在国际事务中都能坚定不移地代表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共产党人，必须顺应和代表这一历史潮流，才能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三）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正确处理党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意共中央的两位书记处成员在交谈中谈到：原总书记陶里亚蒂早就认为垄断的、家族的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庞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工人也不是过去'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概念。他们还谈到：苏联搞军备竞赛拖垮了经济，美国搞军备竞赛促进了经济。

上面讲到的四次讲话是四国之行最重要的政治或政策声明，还有多次答记者问和宴会的讲话，回国后曾把这些文件汇集出版了一本《访问西欧四国言论集》。事隔30年再来看这本小册子，还是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

撒切尔夫人宴会上的一个插曲

撒切尔首相的接待还是很友好的，但是她这位有名的'铁夫人'毕竟总要表现一下她坚强的个性。她在宴会讲话中说："总书记先生，您将访问大英博物馆，具有影响力的十九世纪大思想家——马克思在那里曾度过许多时间。如果您的访问能长一点，我就会建议您也到科克第访问，那是亚当·斯密出生地。马克思经常抱怨他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亚当·斯密分析经济行为的著作中——也被马克思认为是经典之作的《国富论》中也没有直接提到资本主义。"

撒切尔夫人政治上是非常尖锐的，她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要说'少谈主义'。胡耀邦在答词中，做出了很得体的回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中国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重要著作之一。这本著作，高度评价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了近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因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仍然应当不断地吸取和概括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逻辑，我相信，我们两国可以而且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地推进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从四国之行看当时西欧的政治动向

访问期间胡耀邦一行同四国总统、总理、副总理、议长、前总统、前首相、重要州长、市长、各政党领袖、经济界人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李鹏还单独同不少内阁成员、部长、经济界人士、企业家商

谈。费孝通单独会见了留学生、华侨和华人，到大学发表演讲，同学生座谈。

以下简单谈几点四国之行中看到听到的情况：

（1）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西欧国家离不开美国，但重视欧洲联合，重视维护独立自主。针对美国搞"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星球大战"，西欧国家正在实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合作的"尤里卡计划"，法国公开表示不参加战略防御计划。

西德总理科尔表示：对美国不适当的行动要反对，西德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但不是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抱怨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盟国商量。西德外长根舍说：由美苏两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和欧洲必须占有自己的地位。法国坚持要继续进行核试验，密特朗总统说，在核武器问题上要保持独立的决定权，联合的欧洲可以成为世界平衡的重要因素。希拉克总理和外交部长雷蒙还说，法国不同意美国飞机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飞越法国领空去轰炸利比亚。

（2）西欧国家普遍关心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对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寄予一定希望。他们希望美苏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希望中苏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又担心中苏回到结盟关系。

胡耀邦同西欧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介绍了中苏关系的状况，说明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有待于解决三大障碍问题，这就涉及柬埔寨问题。希拉克总理同意中方意见，表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后来希拉克任总统时，柬埔寨和平协议1991年在法国签署。

（3）关于两个德国的关系问题，这次谈得不多，科尔总理表示"德国的民族统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勃兰特主席说："如果今后几十年，东西欧两部分关系发生变化，也会对两个德国产生影响。那时也许会找到一种新的共处形式。"在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三年多以后德国就统一了。

（4）这次出访前，由于发生了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和苏联相邻的西欧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在访问四国时，对核电站应采取什么态度，成为社会上热门问题。法国、英国坚决支持发展核电的政策（法国有60%以上电力来自核能）。意大利有点保留。西德科尔总理的执政党坚持发展核电，绿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态度摇摆。香港也有人反对在广东大亚湾修建核电站。在这样的情况下，胡耀邦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中国在核电方面，一定要发展一点，这是大前提。"第一条意见，这是现代化技术，不应该盲目地反对。第二，核能又是危险的技术，需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这样既讲了真话，又合情合理。

（5）关于梵蒂冈同中国直接接触问题。1986年时，梵蒂冈同111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外交关系（包括台湾）。原梵驻华公使黎培里因干涉我内政，1951年9月被南京市军管会驱（下转70页）

《光明日报》“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

● 陈 英

《炎黄春秋》1999年11月号上，刊出杜导正同志《鼓励记者讲真话》一文，其中谈到《光明日报》1982年披露一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一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在当时的反不正之风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也有创新。虽然事隔多年，但对新闻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是当年这组报道的亲历者之一，很愿把其来龙去脉以及得失，略作介绍。

1982年4月，笔者收到山西省科委一友人转来的一封揭发信。寄信人是某卷烟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邓俊三，揭发该厂把五千余条香烟送人情。我这位朋友见义勇为，支持揭发者的义举，并请新闻单位给予援助。我把这封揭发信排出小样送总编室，当时一位副总编认为烟厂以烟送人情可能存在，但是否有这么多，需要核实。不久，核实材料转回来了，认为事实没有出入。随即领导又指示，把小样寄山西省委，请求调查处理，然后再考虑是否发表。

当年3月，杜导正同志已由新华总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时我把此稿跟他谈了，他很高兴，说党中央现在正在反不正之风，这个材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作为一个典型抓它一下。于是即派我同编辑徐尊六一起去太原，拜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罗省长对揭发信公开见报表示支持，他说，已对报社的材料作了批示，太原市纪委已为此派人到烟厂调查。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太原市委书记李好山等领导也表示支持，并准备在调查结束后对此事作出处理。我们拜访太原市纪委领导时，他们说，来信揭发的问题是属实的，从1979年到1981年有单据可查，乱拿乱送的香烟就达一万多条；该厂管理混乱，党组织生活不正常等情况也很严重，对此要一查到底。劳模出身的市经委主任对烟厂存在的问题也感到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报社公开揭露非常好。

回到报社，杜导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再去太原一趟，把收烟人的名单拣重要的抄一份来，公开见报；同时开一些座谈会，把发言整理出来见报。8月12日，揭发信在《光明日报》一版重要位置发表后，我们就奔赴太原，同市纪委的同志一起到烟厂，从4600多张白条中，摘取了一些，将接受卷烟厂领导人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制成表格寄回报社。

8月26日，本报在《同志，请警惕“关系牌”香烟的污染》的标题下，发表了太原市几名读者的来信和接受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许多读者投书本报，表示非常支持，并希望舆论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起促进作用。

27日，又刊出了记者整理的《烟厂部分人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者大多数是知情人，揭发比过去更详尽。

28日，《光明日报》又刊载了由山西省轻工业厅、省经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烟草公司、省委研究室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发言。大家在发言中就不正之风进行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

8月31日，报上又发表了支持揭发“关系牌”香烟的读者来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

此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同志又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一些陆续发表。这些读者就卷烟厂问题继续提出批评并建议：对白拿烟的单位和个人，限期一个月交还烟款；对检查不好、拒不交还烟款者可再公布名单。有的读者说：“纠正不正之风应见行动”，他们认为“公开点名好”，“要把公布名单的做法坚持下去”。

接着，报社又发表了北京、武汉、苏州等地以

及海军、装甲兵等单位的一批读者来信，也加了编者按。

9月10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轻工业厅党组要求下属单位以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等措施。该厅还通知各地市轻工业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报送试用产品、样品和展品等，坚决刹住类似卷烟厂发生的不正之风。

9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接受香烟单位和个人退还烟款的消息，并发了编者按，对许多单位在领导督促下，知错改错，迅速退还烟款的行动表示欢迎。9月16日，轻工业部纪委组织的座谈会发言在《光明日报》刊出。杨波部长在会上说，《光明日报》关于太原卷烟厂的报道，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监督，部党组表示热忱的欢迎。卷烟厂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烟厂有，酒厂也有，其它一些厂也有类似问题。批评这件事，对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有很大好处。过去，我们部党组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在会议上反复讲过，也发过多次文件，还定出了《约法五章》，但现在看来，对下边经常检查不够，部机关一些同志也未按这五条办。接受烟酒一类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影响就更坏，不能把这件事当成生活小节，必须提到有关党风的高度上来对待。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其中之一就是党风的根本好转。党风怎样，必然影响到民风，影响到社会风气，所以说，认真纠正卷烟厂这样的不正之风，就是贯彻十二大精神，就是落实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紧接着，《光明日报》在9月27日刊出山西省委办公厅就本报报道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敦促吸“关系牌”香烟者赶快退还烟款；同日，还发表了轻工业部烟草工业研究所四同志退还烟款的消息和三封读者来信。如太原市供销社一读者来信说：“这个时期，在我们太原市，从机关到家庭院落，到处可听到人们在议论，‘关系牌’一类的不正之风，不能让它刮下去了。”河北省承德市一读者来信说：“揭露烟厂领导人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不正之风，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不这样做，党风的根本好转谈何容易！”

9月29日，报社发表了山西省经委就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内称：“报道是对烟厂和省工业部门及企业的有力鞭策”，并特别强调广大职工群众有监督的权利，对违犯规定的人，要坚持抵制和检举揭发；对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要从严处理。太原市委也要求烟厂领导诚恳地接受批评，并要求其它单位党委也要认真学习省委办公厅的通知。

10月7日，报社又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道。如轻工业部党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烟厂；山西省直属机关党委和省轻工业厅成立专门班子负责清退落实工作；太原市纪委派出的调查组由5人增至13人。《光明日报》还刊出了山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写的《我的检讨》、轻工厅一位处长交出了白拿的43条烟款，其他许多收过烟的人也纷纷还款。在清退过程中，有的虽有白条、送烟单据，但本人并没有接受香烟；有的白条上记的多而实际拿的少；有的白条记的少而实际多；有的付了款而没有销账，还有属公用香烟而记在个人名下，还需进一步清理。

10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我执笔，并和徐尊六共同署名的《一个勇于抵制不正之风的战士》的通讯，表彰揭发人的事迹，还在一则短讯中表彰了原厂党委书记秦斌，他从不白抽厂里的烟，而是到市场去买，虽然这位老同志已去世，厂里的人还很怀念他。

《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就《光明日报》对“关系牌”香烟的报道，登了篇综合消息，还发表了短评《要有那么一点志气》，评论说“不正之风是能够刹住的，《光明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白拿香烟问题，抓住不放，……对纠正不正之风是一种切实的贡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它报纸，也对《光明日报》的报道作了广播和评论。由于山西省委和轻工业部坚定地支持报社，山西及轻工业系统的反不正之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这组报道中，由于我们工作不细，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公布的名单中，有王茂林同志收了四条香烟。罗省长指出这不确实，“他不会吸烟，也没收烟。”他还说，近日，太原市政府要进行换届选举，中组部对市长人选已作了考察，群众对

不正之风反应强烈，这个名单的公布，恐怕对选举要产生影响，所以，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讲明茂林同志没有收过烟，他建议报社最好对此事发个更正，以挽回影响。

我听了头脑不禁嗡了一声，立刻冒出汗来。怪我们太疏忽大意了，事前向王茂林同志核实一下就好了。省纪委副书记毕义举也对我说，原省公安厅郭庆年同志向他诉委屈，说他的烟是烟厂按半价卖给他的。后来在清退过程中的确看到白条所记并不完全正确，为此，报社在10月7日公布部分单位和个人退款情况一览表时，特加一说明："8月26日所列单位中，有经烟厂厂长索占忠批准送给太原市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四条烟，经查，王未收，是被烟厂办公室主任挪为招待用了。"后来我再去太原时，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维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邦应一起，同我到王茂林同志家拜访，当面道歉。可惜王外出未归，只得写了一封致歉信，托维庆同志转他，总算了结了更正的心愿。

在离开太原前，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了徐尊六和我，由省委副秘书长萧聪慈作记录。霍书记说《光明日报》对烟厂的报道很好，推动了山西反不正之风的斗争。记者表示这是与省委的支持，特别是罗书记的指导分不开的。由于记者的疏忽，在王茂林收烟的问题上给省委添了麻烦，甚感不安。霍书记说在个别枝节上出点问题难免，今后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此后，市纪委调查组全面查清了烟厂存在的问题，证明揭发的问题全部属实，上级有关领导为此调整了烟厂的领导班子。

事后，新闻界同行盛赞这组报道干得棒，有的说"漂亮"。我实事求是地说，这哪里是记者的功劳啊，当初我只想把揭发信登出就算完成任务了，哪里想到搞这么大规模和这样长的时间啊！

事情过去多年，今日的那个卷烟厂怎样了？不幸的是，从1999年起，这个卷烟厂的职工和省烟草公司的离退休干部，多次上京到有关领导机关，揭发该厂厂长等的重大经济问题，现厂长已被免职，中国烟草专卖局已派出调查组去调查，相信不久即会水落石出。这使我想到，新闻报道最多只能起个治标的作用而不能治本。要治本则必须改革企业制度，并伴之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制的健全。不然腐败行为就会像毒菌一样，在适当的气候下重复滋生，烟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欢迎订阅2008年《中国老年报》

老干老龄
人生家庭
医疗养生
理财美食
人物运动
环球时事
老年大学
史海烟云

传老年之声
解老年之忧

邮发代号：1-133
订报咨询：010-58122351、52、53、54、55、56
月价：9元　　年价：108元
每周二、三、四、五出报；三期正报，一期周末版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斜街4号
邮政编码：100020
拨打当地免费电话11185，邮政可上门办理订阅手续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随时订阅）

言老年之事
做老年之友

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 徐慰曾

1997年2月24日下午，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出版界缅怀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座谈会。会场上，悬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大照片。照片摄于1985年9月10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团之时。看着这幅照片，我不由得想起了当时的另一个镜头：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先生，向小平同志赠送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本的镜头。

《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是西方国家一部历史悠久、具有权威性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它的第一版于1768——1771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问世。经过几个世纪的沧桑变迁，至20世纪初，该书的版权为美国人所得，后几经易主，70年代起由位于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以下简称"不列颠公司"）编辑出版该书。不列颠公司将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了100套，专门用于馈赠全世界的贵宾。吉布尼先生向小平同志呈送的便是其中的一套，共三卷，是非常珍贵的藏本。到80年代初，《不列颠百科全书》除英文版外，已有法、日、希、西等文版陆续问世；出版的第15版是由世界各国4000多位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内容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和各个方面，耗资2500万美元，凝结了众多编辑的多年心血。不列颠公司早就有出版中文版的愿望，中美正式建交后，他们便积极主动地探索与中国合作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可能性，并于1980年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

我是1978年起到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1980年合作出版协议签订后，我便具体负责编译、出版工作。1995年起，又负责《不列颠百科全书》全译本的编译出版等工作。因此我能有机会了解一些小平同志关心、支持我国大百科全书建设和出版的情况。1985年9月10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客人之前，我受组织委托，向小平同志汇报了经他亲自批准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等情况；小平同志接见美国客人时我也在场。至今我依然为他那非凡的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所深深折服。应该说，没有小平同志，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景，就不会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出版事业，就不会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更不会有中美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记得是在1979年11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

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右三为本文作者

小平同志第一次接见了时任不列颠公司副总裁的吉布尼等人，当时中方陪同接见的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刘尊棋、阎明复等。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来加速现代化建设。在谈到百科全书时，小平同志说，三十几年了还没有搞这些事，这也反映了我们的落后。在美方提出中美双方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情，并当场就批准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出版合作项目。

1980年8月，中美双方出版机构负责人在美国签订了合作出版的协议书。同年9月，以不列颠公司董事长斯旺森为首的董事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当时正值中国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第二次接见了美国客人，他在会见中指出：中国人民对新的路线、新的方针政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是坚定的，同时也是有信心的。我国的形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比一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认识弱点，才能克服弱点；只有认识自己不行，才能努力去学习，逐渐地行起来。认识落后，敢于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有这个勇气。外宾们听了之后，非常感动，高度评价了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认为这体现了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他们回国之后，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和其它报刊上作了介绍，产生了良好而巨大的影响。小平同志在谈到这次出版合作时，再次对外宾们说：这是件好事情。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项工作同四个现代化有关嘛！

小平同志除了称赞这项出版合作外，还对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作了非常英明的指示。他对美国客人说：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中国的部分自己来写，可能还有许多议论、争论和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对外出版合作中的具体体现，也可说是"一书两制"的英明构思。

在经历了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如果没有小平同志两次接见美国客人，并当场批准这项合作，中国一家出版社要和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这样一部涉及到许多政治敏感问题且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大不相同的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关于编辑方针的指示，也为以后解决一系列难题指明了方向。后来，我们正式成立了由中美双方学者组成的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会开过三次全体会议、十余次工作会议，经过反反复复的协商、讨论甚至争论，最终解决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该书得以出版。

在方针确定以后，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编译出版一部几千万字的西方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没有各个学术领域、各个方面包括有关中国的各个专业的广大专家、学者和大批翻译、编辑人员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国内出版界都曾先后作过这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是小平同志提出了"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是他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特别是改正了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右"派错案，使广大知识分子重获新生，能够精神振奋地投身于四化建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刘尊棋、钱伟长、周有光和徐慰曾以及参加这项工作的400多位专家、学者、译者和编辑，凡是上了年纪的，大多数都受过不公正待遇，有过坎坷的经历，但是在小平同志的感召下，无不以饱满热情，无私忘我地投入了这项工作，最终仅以五年多的时间，使近代中国第一部中美合作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于1985年开始问世。

1985年9月10日上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出版，小平同志第三次接见了美国不列颠公司代表团和我方文化部与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我对这次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明年全部出版是很好的事情。这部百科全书是非常有用的。这是知识读物。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缺乏知识，知识不足，应该从多方面取得知识。

小平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在短短的五年之中三次亲自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和我方有关负责人，谈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赞扬中美双方合作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他以卓越政治家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重视中美关系和文化出版工作，也是对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全心全意地搞好出版工作。

（作者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　晨）

在上海遥望昆明

——六十年前震惊上海的两次民主浪潮

● 袁 鹰

1975年秋天，我有机会去昆明，曾经专诚去云南师范学院校舍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瞻拜“一二·一”运动烈士墓，默读冯至先生那首《招魂》的诗碑。西风残照里，徜徉不忍遽去，仿佛又听到三十年前联大师生们要求爱国、要求民主的呐喊声，又听到反动派刽子手的机枪声，霎时间心绪如焚，不禁喃喃自语：“遥望八千里，迟来三十年。”是的，三十多年前，我就衷心向往这个地方了。

抗日战争后期，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我高中毕业前一两年，就向往着去大后方进大学。上海高等学府林立，但是国立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早已内迁，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都是“贵族学府”，我等贫寒子弟是不敢问津的。我早就知道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北方名校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那里办学条件虽然艰苦简陋，却有许多名誉全国的学者，有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这样的校长，有罗家伦、冯友兰、张奚若、钱穆、闻一多、朱自清、钱端升这样一大批教授，他们继承“五四”运动崇尚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形成优良的校风，成为大后方青年学生衷心向往的地方。而且国立大学学费低廉，更是我们这些清寒学子理想的去处。高中快毕业时，我对理工科没有兴趣，学习的成绩也差，很想报考文科院系，特别想读有原北大清华教授们主持的中文系、历史系或者教育系。但是西南联大远在万里之外的昆明，从上海去大后方，不仅要穿过日寇封锁线，交通不便，家里也筹不出一大笔路费和一个人的生活费，祖父和父亲也不放心我一个人走那么远路，所以踌躇再三，终于作罢，只在上海就读于由教会办的东吴、之江两所大学留沪教师联合筹办的华东大学的教育系，两年后，抗战胜利，恢复各自原校名。昆明留在遥远的梦中，却常常听到更多的有关西南联大的消息，知道它的爱国民主活动十分活跃，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歆羡之余，更加怅怅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相继战败，世界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国内，国共举行双十会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等等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拥护。上海人民经受了八年日本侵略军的血腥统治和残暴蹂躏，一旦挣脱枷锁，获得民族解放，都渴望自由、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地下组织，团结和领导上海工人、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发展进步力量，面对从重庆来的军政人员对收复区的疯狂劫收和种种言行进行揭露和斗争，帮助人民群众扫除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1945年12月，从昆明忽然传来“一二·一”血案的消息，令人震愕而且愤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比当年北平“一二·九”时期用水龙头冲散学生队伍更进一步，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教师开枪射击，制造血案。昆明死难四位烈士之一、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的妹妹于庚梅女士住在上海，是我的好友顾家熙的嫂子。我曾随家熙到华山路去看望和慰问，庚梅女士总是满脸泪痕，她说准备在上海最大的佛寺之一玉佛寺举行一次祭奠，代替去世的父母告慰英灵，尽骨肉的哀思。我将此事立即向组织汇报，地下党领导研究以后，决定支持和赞助她去办，并且将家祭转

上海祭奠李公朴、闻一多烈士会场

为公祭。地下党学委指派圣约翰大学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和我一起负责联络事宜。同时,通过地下党的系统组织和发动学生、教师、职工和文化界人士参加,成为各界人士抗议国民党暴行的示威行动,直接配合和声援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次公祭大会于1946年1月13日举行,开得非常成功。玉佛寺大殿外广场上,一万余参加者肃立在呼啸的寒风中,群情激奋,情绪昂扬。大殿内外,挂满了挽联,每副挽联都充满了控诉和呐喊。如银钱文化服务社送的"机关枪,手榴弹,残杀青年,于心何忍/ 反内战,争民主,和平建国,势在必成。"五金业同人送的"这是什么天下?教授学生遭此屠杀! / 竟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 "光华大学学生联谊会送的"为民主死,死而无怨/ 失自由生,生也有愧。"圣约翰大学三团契送的"你可听得同胞的哭喊吗,死难的朋友? / 我已看见民主的曙光了,继起的人们。"唐 、柯灵两位作家送的"居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 在这般时代, 有如此国家;/ 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 "

寒风中反复响起两首挽歌:一首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圣约翰大学学生成幼殊作词,钱春海作曲),另一首就是周志毅写的"西风凄凄, 大地在叹息,朋友, 你死不瞑目……"歌声凄迷,使会场上充满了哀伤的气氛。

老教育家马叙伦先生被公推担任主祭,他用悲怆的声音宣读祭文:"呜呼先生! 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敌胜利之后。呜呼先生! 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 机关枪、手榴弹, 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然而先生之死,足以警惕民众,使人振奋;足以促进民主,感召和平;足以振聋发聩,开启愚蒙;足以扬清激浊,令人愧悔。先生之体魄虽死,而先生之精神不死。我们得民主一日,即不忘先生一日……"叙伦先生读得慷慨激越,荡气回肠。玉佛寺内外万人伫立,肃静无哗,在风声中更显得肃穆悲壮,只有一些女学生的啜泣声轻轻回荡。但是,当祭文宣读完毕,演讲开始,公祭大会就成为声讨大会、向法西斯独裁开火的誓师大会了。

柳亚子先生上台讲话:"今天到会的人这样多,可见人心并没有死……中国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真心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

林汉达教授说:"做法西斯迷梦的人应该醒醒了。法西斯只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墨索里尼的上吊;第二条路是希特勒的自杀,第三条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切腹! "

南京和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控诉国民党政府和学校当局不承认他们的学籍,对他们进行无理的"甄审"、开除和拘禁,要求得到读书的权利。新新公司的职工代表揭露公司的职工因为检举汉奸反而受到阻拦和迫害的经过。小学教师呼吁收入太低,养不活家小,向市教育局要求却被拒绝……

公祭大会在雷动的掌声中通过了给蒋介石和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份电报，提出了八项要求：一、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立即实现“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三、立即逮捕公审汉奸，鼓励人民检举汉奸；四、立即严惩昆明惨案主凶关麟征、李宗黄及青岛屠杀青年学生之凶手；五、立即明令废止束缚学生民主自由之法令、办法；六、严惩贪官污吏；七、提高教师、职工之待遇，救济失业；八、提高妇女地位。八项要求，体现了上海人民也是全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的共同心愿和正义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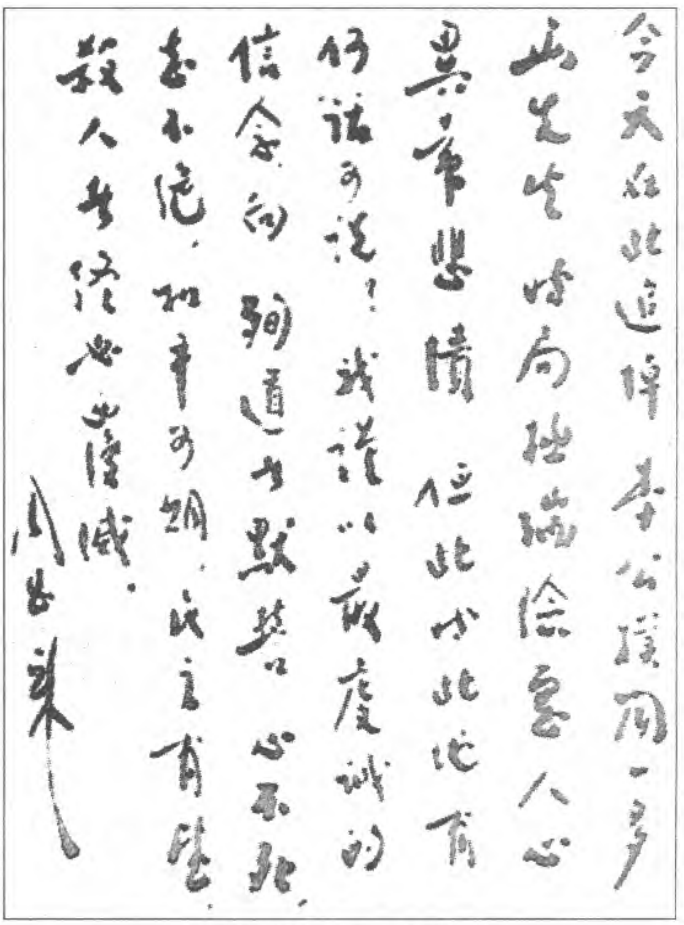
圣约翰大学一位学生代表慷慨陈词：“于再先生他们没有死，他们活在每个人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上！我们难道除了开会追悼以外，再没有别的举动表示我们内心的愤怒了吗？”会场上一万余人抑止不住心头的火焰，响起了同一个声音：游行！游行！

玉佛寺大门外的江宁路和安远路上，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两个头目闻声入内，说是奉警备总司令手令不得有妨碍治安的游行。大会组织者要他们上台向群众宣布，那两个色厉内荏的家伙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台。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蒋介石前一天刚刚下达“停战令”，他们那个警备总司令和警察局长未必敢在国际观瞻所在的上海惹出乱子，只好板起面孔说：“你们要游行，出了岔子怎么办？”学生立即顺水推舟：“那好，就请你们保护游行吧！”两位军官只好挥挥手，军警调转身，尴尬地走在前面。

游行队伍出发了。队伍最前面是早已预备好的横幅，上书八个大字“纪念昆明死难师生”。跟着是两面大旗“人民不死！”“民主万岁！”上海女中军乐队本来就安排在会场后部寺院大门口，大门一开，她们立即回转身，喇叭响起，鼓声咚咚，成为游行队伍的先导部队。一万余人组成的洪流，浩浩荡荡，有声有色地流淌在上海市区的马路上，从江宁路折向南京东路，到河南路向南再向东，一路上口号声和歌声不断。马路两旁挤满行人，有不少年轻人自动地挤进队伍，跟着游行。经过上海市政府时，游行队伍高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馆门前高呼“要求新闻自由！”“中央日报不要说假话！”到福州路市警察总局大门口，就高呼“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队伍到外滩解散时，已近黄昏时分。许多人从早晨去玉佛寺直到此刻，没有吃午饭，甚至没喝一口水，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地走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外滩才解散。

这次在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游行，显示了上海青年学生、知识界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显示了人民群众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坚强意志，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顺应人心、团结群众的潜力。自然，对反动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也产生了震慑，他们的宣传工具一起开动，说是共产党“利用昆明事件煽动无知学生闹事，扰乱治安，反对政府”。他们不懂得教育人民、激怒人民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凡是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同人民为敌的人，最后只能葬送自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半年后，炽热的7月，从遥远的昆明又一次



周恩来悼李公朴、闻一多词手迹

传来使人震骇悲怆的噩耗：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斗士五天内先后被反动派的特务残害。那一时期，阴霾连天，战火遍地。蒋介石一面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调兵遣将，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一面加紧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周恩来同志则率领和谈代表团，根据党中央的策略和方针，在南京和上海通过多种方式，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发动进步力量，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条件，向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4日那天上午，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利用当时中共和谈代表团在南京上海活动、蒋介石还没有丢掉"和谈"遮羞布的有利时机，在天蟾舞台举行一次大规模集会，公开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位为民主献身的烈士，再一次用响亮的声音表达爱国民主的正义要求和意志。那次大会，在上海也是解放前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成功的公开盛会。国民党党政军头目们满以为上海在自己掌握中，他们可以完全操纵这次大会，却没有料到台上尽管是上海市长吴国桢主持，台下却坐了许多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步团体组织来的学生、职工和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吴国桢是美国留学生，喝过洋墨水，同国民党那些党棍和军人不同。他在台上自吹自擂，说上海是"最民主的城市"，理由是上海可以看到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可以举行发出各种声音的集会，却一字不敢提国民党军警特务抓人打人的事实。按预定演讲次序，第一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目潘公展，他同吴国桢的论调差不多，指桑骂槐地说"哪个地方只有一个党活动，只有一种报纸的声音，那个地方就没有民主"云云，台下听众明白这是强词夺理，就一起用嘘声回答他。主持大会的洪深教授宣布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先生，会场立即肃静无声，全神注视台上，却意外地看到邓颖超同志从后台走到台前，身穿一身素雅的旗袍，手中拿着一张纸，等掌声停歇下来，就用沉痛肃穆的语调发言，她说："周恩来同志因事不能来参加追悼会，委托我来宣读他的悼词。"挤满了三层楼的剧场，立刻鸦雀无声，静听邓大姐在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当邓大姐念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那一句时，肃静的会场突然爆发春雷似的掌声，这句话说到人们心坎里，说出了人们强烈的愤慨和憎恨。念到"心不死，志不绝……"那几句时，每念一句，就引起一阵掌声，人们在心里跟着一起宣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誓为民主的实现、革命的胜利奋斗到底！这篇仅仅七十三个字的悼词，第二天全文发表在上海进步报纸上，在阴霾笼罩的上海，对所有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群众和共产党员，成为斗争的战鼓，进军的号角！"杀人者终必覆灭"，多么有力的宣判，多么英明的预见！仅仅过了两年半，胜利的红旗就飘扬在黄浦江头。

那天我坐在剧场里，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沸腾场面和热烈气氛，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倒在昆明街头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英灵有知，看到今天上海如火如荼的情景，听到上海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也可以得到一些快慰了。1946年这两次民主浪潮，震惊了上海。正是"一二·一"死难烈士和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为人民献出的鲜血，正是西南联大师生和昆明知识界为争取民主自由向专制独裁的反动当局进行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正义言行，对上海以及全中国、当时以及后代学生和知识界的爱国民主潮流起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那必然是昭昭载入史册的。冯至先生六十年前的《招魂》不是就充满深情地预言了吗：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的脑里忘却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正义，快快地到来，/自由，快快地到来，/光明，快快地到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王亚卓事件始末

● 邢 卓

给黄帅写信

1973年严冬，内蒙古乌梁素海边的荒草枯木笼罩在肃杀的寒气中。内蒙古建设兵团十九团团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聊起当前教学状况，心情郁闷，神色忧伤。

夏季时候，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中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紧接着北京又杀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几篇搅乱教学秩序、对抗老师的日记见诸首都的重要报刊。在其带动下，大量的“反潮流”英雄小将横空出世，把教育界搅得狼烟四起。

团中心学校虽处地偏境，可北京的一响一动在这里皆有回应。学黄帅的孩子们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学校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们都是响应号召敲着锣鼓来边疆搞建设的“知青”，这会儿成了受攻击的标靶，令他们心气难平，于是，私下里酝酿集体辞职！

读书的是资产阶级“小绵羊”，造反的是无产阶级“排头兵”，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团政治处的学习会上，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出语附和。会下，我的直接领导，现役军人、宣传股长崔钦也袒露自己的一肚子不满，主任老玄也对黄帅现象颇有微辞。

197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晚间，我和平日意气相通的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言语中情绪都有些激动，表示不能听任她胡作非为，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王文尧分析说，黄帅事件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她小小年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跟当前政治需要有关。恩亚立说，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我说，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进行教育。当然我们没有奢望能对小学生“教育”出什么结果，也没有料到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名“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

午夜时分，我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信件摘要如下：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

王亚卓给黄帅信手迹

左起：恩亚立、邢卓、王文尧

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这方面，我不多说，请你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三思！

……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立即寄出，也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酿成一桩历史事件，否则一定会把这封信留个底稿，做个历史见证。总之，一颗定时炸弹就这样在北国隆冬之夜制造出来。

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作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

人民日报社来电话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三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我猜不透，想不明，但绝没料到谜底会是那样的凶险。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我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黄帅的公开信说：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公开信更凶狠的言辞还在后头，听到这里已令人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王文尧、恩亚立两战友此刻是否听到了这套广播？他们会作何反应？兵团的首长战友们会作何反应？明明白白点了十九团的名，我们卷入漩涡了！

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1月26日，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回信日期是1月19日，差7天时间。也就是说，我接到她的亲笔信时，她已经拟写这封公开信了。

小学生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不是轻易能发得出来的，来头不小呀！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我："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崔股长胸襟坦荡、心直口快，我们三人都是他亲自从连队选拔上来的。我父亲'反右'时受牵连，算是有历史问题。他坚持己见，全力提携。恩亚立的家长政治上也有'瑕疵"，也是崔用力拉来的。我们都是他的爱将，都想努力作出成绩为他脸上增光，谁料想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主任面色严峻："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呀。""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我想辩白几句，只觉得口焦舌燥。主任说："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十九团的干部战士们炸了窝，一拨一拨的熟朋生客闯进我的小屋，打探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我对北京方面的脉络一无所知，只是不停地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以前所在的六连几位朋友来了，态度鲜明地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公平，只发表黄帅的信，为什么不把王亚卓的信也发表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我的情绪也激荡起来："我要跟她辩出个是非曲直，真理不辩不明！"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竿子捅了多大个蚂蜂窝。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锋寒刃冷，句句刀枪出鞘。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风云得意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为了加重石头的分量，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姚文元

二月七日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江青

二月九日下午七时

同意。

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还指望与其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实在可笑。“王亚卓”三只螳螂已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十九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恩知道我给黄帅写信，说大家确实议论过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这话并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的确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王、恩沟通，他俩也回避不开，全都承认从头到尾裹在其中。

下一步工作组施压，要我们交出后台。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用意，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们三人实在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六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上台发言。多数批判者调门虽高，声音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上有人振臂喊口号，台下应者寥寥，有时竟是一片嘘声。群众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工作组成员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

批判会开成这个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六连这样稀松，却也没什么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某保定籍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书：好自珍重。弟兄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六连同志都非本愿，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他们心里愈发不是滋味，苦于找不到机会向我解释，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

人民日报

斗争哲学。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黄帅的一封公开信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

人民日报发表黄帅复王亚卓的信

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我背着行李来到陌生的四连,出乎意料的是四连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拿我当“坏分子”看。距四连十五里地的五连有我几个朋友,他们不但常来看我,还嘱咐自己在四连的朋友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到连部请假时,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五连的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据说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拿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地一通训斥,没想到七班长竟当面顶撞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指导员一时语塞。

战友情深

8月,乌梁素海的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14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又担心远方的我,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才知道离我所在的四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六连紧挨团部,六连的朋友们主动接待了小妹,他们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请她品尝用海水和盐粒煮的新鲜鲤鱼。小妹心事重重地不断问及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我赶至六连时天已漆黑,小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必须返回。还是六连的弟兄们妥善地把小妹送上返京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里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

一月后,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得以返回家乡保定就医。小妹由于精神遭受极度折磨,气短息弱,骨瘦如柴,当晚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裂,悲愤欲绝。回内蒙路上在北京转车,四连友人张立国正在京探亲,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我喝得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背着把我弄回他家。我一夜呕吐得吐了胆汁,他一夜守着我不曾合眼。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么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将为我们作出公正评价。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古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顶着星月从四连赶往团部。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千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做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才赶到团部,崔股长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蹒行一夜的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又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我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三年后,“王亚卓”冤案彻底平反。

(作者系作家、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责任编辑 李 晨)

不堪回首的那一天

● 黄 鹂

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述说40年前不堪回首的一天，那是我终生的噩梦，挥之不去却又难于述说。数百条活泼泼的年轻生命就在我的眼前一瞬间化为亡灵，而我从成堆的尸体中逃出生天。那是1967年的武汉，那一天是8月1日，我还不满14岁。

1967是中国的凶年，更是武汉的凶年。

前一年的7月16日，是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告伟大领袖身体依然健康的重要日子。这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汉，事先就通知武汉方面他要戏水长江。他力斥一干高官对他73岁高龄的担心，无论天气如何、水流如何、安全工作做得如何他都一定要游。那一天他如愿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便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是全中国都燃烧了起来，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武汉特殊的纪念日。

一年后的7月，文革和天气一起进入白热化，武斗、流血、死人已是家常便饭。惊天的所谓“7.20兵变事件”，更是把这座火炉之城变成了炼狱，江城三镇的上空弥漫着疯狂和仇恨，人人亢奋莫名。7月16日，“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纪念渡江活动，由于两派血腥的武斗给耽误了，于是“7.20事件”之后的8月1日，在造反派绝对掌握了权力之后，这样伟大的纪念活动是一定要补上的。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1967年8月1日，竟成了武汉人的劫数。此时的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新掌权的造反派是这场渡江纪念活动发起者，但参加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对毛泽东主席一腔热爱而来的。造反派掌权者可以发起活动，但却没有任何管理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仅渡江者就上万，还不包括看热闹的。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这个业余诗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我浑身

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华师的、体院的、水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贻弄孙的年龄了。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我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青、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日记的胡适》　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翻别样的风景了。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商户号：111300600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牛棚杂忆	季羡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伶　王一心	29.80	6.00
历史的误读	刘济生	20.00	5.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杨继绳	36.00	7.00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　陈少铭	38.50	7.00
1949年后的梁漱溟	汪东林	23.00	5.00
红墙见证录（上、下）——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定西孤儿院记事	杨显惠	25.00	6.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兖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19.00	5.00
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羡林	22.00	5.00
普洱茶健康之道	周红杰	39.80	7.00
松针养生革命	董看看	39.80	7.00
陈松梅花集	陈　松	38.00	7.00

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

——白介夫日记摘录

● 白若莉 整理

这里是按着时间顺序摘录的父亲的日记。父亲当时在东北长白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长白县的土改工作。

发表日记的目的不是为了树碑立传，也不是为了评论土改的功过是非，而是为了用这些日记作参考，尽量地还原在东北长白山地区有关土地改革这一段的历史真相。“史”要以“实”为证，为了让读者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东北长白县的土改运动有个真实而简要的了解，我抱着尽量客观的态度，选一些有信息量、有代表性的段落，即使今天看来有明显的错误，也尽量摘出，决不扬善隐恶。

日记中的一些段落我做了一些注解和说明。

1947/ 2/ 13

积极分子互相包庇，互相支持，他们分到的东西较其他群众为多。为了纠正干部分果实太多的偏向，进行了个别谈话，我找李彦林，还好，李彦林愿意把太多的东西拿出来。群众中有一种落后意识，总觉得官大了说话管用，因而有长字的干部容易镇得住。

1947/ 2/ 14

突击分地，能否不发动斗争？单纯分地。不解决春耕中的困难，群众会不满意，如果分地后要组织生产，那就发生了耕牛、种子、农具等一大串难题。这些困难只有在地主身上找出路。长白县当时不缺土地，到处都是荒地，想种地，出去开片荒地都可以。所以所谓地主，除了占有土地，主要是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主也是当时农村生产的组织者，解决生产问题还要靠他们。

1947/ 3/ 15

马鹿沟今天分斗争果实，召开村民大会。新选的农会长，妇会长都登台讲话。一个俘虏兵讲他原来是国民党兵，以后被俘，希望大家不要盼国民党，国民党来了穷人遭殃，不要抱地主的粗腿子。从工作以来，今天的马鹿沟要算最热闹的，锣鼓喧天，在三面大旗后面拉着一里路长的群众队伍，接着是十六辆大车，十张扒犁，浩浩荡荡向赵四家的窝铺前进，“群众要给赵四搬家了”，搬他一块木头，一个破缸都是愉快的。谁看到这样一群人的动作不害怕呢？赵文郁躺在床上默默不语，我想像不来他是什么心情，几个大的女孩子围在一圈涕泣，最小的不懂事的孩子仍在玩耍。农民们是自私的，一进院子先找自己分得的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的先搬上车去，一个破钉子也愿意浑水摸鱼拿去才称心，有好几次把应留的东西搬出来，搬上大车，以后又给抬下来。赵家的人忙着留东西，在他们，并没有“打烂账”，还是竭力往回抓许多，一块咸菜也要请求一次。拉着一满车东西送到医院去，有精米、黄菜、咸菜、留声机等，院长真的被感动了，不知怎样招待我才好，不知给群众说什么话才能表达出他的兴奋和愉快来！

这里可以看到地主在群情激昂，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的顽强反抗和无能为力，可以看到贫苦农民的忠厚与自私，保守与贪婪。

1947/ 3/ 16

下午，吕梦会同志来冲动地提出，马鹿沟给十九道沟的果实太少，据他们听到的消息，有200石谷子，几十匹布。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多。

我深感吕的个性太强，主见太强，对自己工作的自信也太强。

1947/ 3/ 21

老关的病越来越严重，他惦记着我和刘部长，说“老白和刘部长来，我的病就好了。”发高热已使他神经完全错乱，一开口就说胡话，但今天下午还能认识人，我去看他，他模糊地知道，我从肖政台那里回来又去看他，他似乎又更明白些。也许是回光返照呢，我不敢想，我自欺欺人，所以听了医院说“不要紧”就回来了。

1947/ 3/ 22

还没起床，肖满样从病房打来电话。没过一分钟，小马又来电话，关部长已经死了。我不愿意相信。只要熟悉他没有不敬爱的老关与世长别了。我匆忙的去，进门看到他还是盖着我已经熟悉的那床红被子，脸上盖了白纱布。我不相信，不觉得他是死了的人。有好几次似乎明显地看见他呼吸的震动，像以往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一样，可是老关毕竟停止呼吸了，那只是足以引起伤感的错觉罢了。当年领导和参加土改的干部，大部分是从延安派的，在那种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不少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1947/ 7/ 25

昨晚住在赵吉昌家，佃农，经营小商。今天上午搬到曹家来。赵是第一次斗争崔伪村长时的积极分子，胆大，敢讲话，对分地、分果实、干部，都不满意。据他说，只要开大会，一定可以搞起来，我和黄燕同志也是这样了解。群众不至于太胆小，不敢讲话，目前要注意的是如何稳住地主，不至把浮财弄光，群众无所得。下午赵吉昌又来，越说劲越大，从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如无大问题，可成积极分子。但不要忘记，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有落后的基本群众参加，否则又造成少数积极分子的活动，几个人的包办代替，其后果是恶劣的。

1947/ 7/ 26

昨晚农会大会有不少腿子，甚至有地主参加，仅此已足证这里的工作情形了，和第一天来时所受的冷淡相符。全体同志分头去了解情况，抓不到劳而又苦的，只有从无吃粮为入手条件。根据村长的反映，再加上刘学南、赵吉昌的反映，已大致发现了一批真正的缺粮、困苦的农民。下午去毛田发地里。

毛田发，一个极纯朴的农民，穿着一件破到不成样子的短裤，比裤子历史更长的一顶礼帽，代替草帽。浑身上下污垢。拘谨和恭敬的态度，表白着他的苦难历史和忠厚简朴的思想作风，黄燕同志替他去耪地，我和老大爷坐在地头唠嗑。他的生活很苦，前些日子打短工，赚钱买了三斗五升粮食，掺杂着菜，勉强度日。他计划要维持到新粮下来。今上午只煮豌豆角吃，凭着豆荚充饥，支持一天的体力，情况甚凄惨。老毛大爷一家五口人，来这里四五年，一辈子没干过轻活。他说这里的地主比海南家的还“磕碜（”音）。问起他分地分粮的事他没有很多意见，他知足，他满意了，他心眼里感激共产党，他说“要不是光复来了八路，我们一家不会饿死也得坐拘留（交不出苛粮）”。痛苦的回忆把他拖回到伪满时代。和现在比较，他觉得他已经翻身了，当我给他讲地主压迫穷人，讲一个人的好景不由天命决定，讲要翻身非要打倒地主的时候，他沉浸在深远的思索里，然后看着我说，“就得那样？那样行？"行。”我这样回答，“非这样不可……”他觉悟了。我送给毛大爷一条裤子，他送来一盆豆角，我只看见他忠恳感激的表情，而没听见他说出什么好听的恭维我的话，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农民。

1947/ 7/ 27

我到西门外李常胜家去。住在一家矮破的茅房里。地中央安了一盘磨，更显得房子阴暗窄小。他家穷得出名。听了特地找他，老头上山去捞柴火，和一个十二岁的伶俐小姑娘谈了谈家庭经济情况。（略）

我问：粮户有粮能不能问他要？

答：那他会给？

问：给他讲道理，有粮大家吃，他还能不给？

答：人家不会给，我爹说菜瓜下来了，能凑到菜瓜下来的时候。

问：咱借地主的粮吃不好？他的粮放着也无用？

答：我爹说，宁肯饿死也不能拉饥荒。（意为借债）

1947/ 7/ 29

地主鬼办法很多。他们到处藏东西，顶棚上，厕所里，坑洞里，草垛里，无处不有。高丽一家，甚

至着急了把大米、衣服，丢在水缸里，搞得水湿，结果也被群众翻了出来。毛田发最高兴，说起翻身，乐得不由自主地拍起手来。

1947/ 7/ 31

下午由群众自己决定去把韩、张的东西搞回来。满院子被挖，搞出不少埋藏的东西，接着一涌而进马世玉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妇女会搞得轰轰烈烈，打了韩蚬田家，又打张进汉老婆，接着打了张秉忠家，接着押了张秉忠。她们成绩不少，起出很多东西。

1947/ 8/ 11

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基本群众的团结。白天小组长与骨干讨论从哪个地主开刀，有人主张先杀(吃)肉，吃肥的(意指最富有的地主)，有人主张先啃骨头(不太富有的地主)，然后再来狠的。最后意见，先整一个半拉子的，讲理，要东西，没有就揍，给那些肥瘦的看看，晚上召开基本群众会议，分组讨论，情绪十分高涨，在斗争中群众已经基本摸索到真理，“粮户都是一个娘生的，有一个算一个”，“压迫了穷人就当压迫了自己”，已从仇恨个人逐渐转到仇恨地主。如此下去，想不致使工作失败。

1947/ 8/ 11

昨天随便说了一句要来第二次，并通知献东西的快送去，今天天不亮就有人往公所抬东西，另有不少自耕中农也纷纷献东西。估计明天开始处理地主，又可能造成一度紧张与恐怖。

1947/ 8/ 13

我认为一般群众已有了相当高的阶级觉悟，和地主阶级处于一不做二不休的状态。每斗必打，以孙海权与陈尚明最严重，特别是陈，群众恨之入骨，当时真担心他被打死。

1947/ 8/ 14

一般群众已经完全敢讲话了，并对地主阶级仇恨到了相当高度，这应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诉苦教育。明天要吃肥的了——斗争韩蚬田，晚上小组会开得特别热烈，为了要东西，大家主张不要一下就打得太狠，但最后可听群众处理，有人主张毙了。有人主张节省子弹，砸死了事。有人主张抬到腰岭上葬以鱼龟，连麻袋也不给装……走着看吧，恐明天一天不能结束。要出东西后，尚有第二次处理。

白介夫(1948 年)

1947/ 8/ 15

原计划失败了。上午开纪念会下午继续闹秧歌，因为群众的欢乐情绪影响斗争中的悲愤，故把斗争会放到明天上午。三班秧歌把半截沟闹得锣鼓喧天，每家(农会)都分了大米与肉，有不少老乡说，几年来，过年都没有落着猪肉吃，这比过年还热闹，痛快。毛田发乐得扮起装来。给工作队同志作揖，敬酒，在街上天真地扭着秧歌。他们的愉快也就是我们的愉快。

1947/ 8/ 16

酝酿已久的韩蚬田，今天上午讲理后被打死了。其七弟也因被打与害怕，傍晚时死在拘留所里。群众为了讲理要东西，早有准备，先轻打，后致死，开始的情绪竟使部分同志担心，每隔四五个人讲理后，拉下台去打一通，以后追要东西，又是接二连三的暴打。继续将近一点钟后，情绪突然转烈，有人喊出“不要东西了，干脆打死拉倒。”随着情绪高涨，张新会、倪长茂无意识的进行着鼓动工作，群众激动着他们，他们的口号又鼓动着群众情绪。主席台上站满了人，又接着喊口号，最富有鼓动性的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在斗争会上是一句听惯了的口号，但在今天这种场合下，却具有更大的作用。此外，不少人振臂高呼“穷人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有力量”……打、叫继续了四十多分钟。终于使韩蚬田得到他的归宿，

情绪之热烈、动人，在我的群工史上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1947/ 8/ 25

下午基干队追捕逃跑的坏蛋。郝宏义(地主成分，伪满的腿子，压迫剥削人的罪恶很多，光复后曾多次贩大烟，真是人所痛恨的家伙)，郝被追急，跳下江去，钻入石崖，好一个保险的地方，从上面用枪打不着，从旁边又去不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整出头。一脸凶恶像。但是多么不幸啊，过分勇敢而没有警惕性的宋文清，被郝用手枪打断了腿，基干队同志乃至全村群众为这件事激起了最大的愤怒，恨不得立即把他砸死，为了搞出更多材料，我们决定不要他马上死，但从岭上到家里，已被打了四五次。

宋文清的伤势甚重，晚上去看他。在他的母亲和姐姐看来，我去一趟是多大的安慰啊!可恨郝宏义打伤了这样一个忠厚、本分、劳苦的农民，斗争要死人，要流血，越来越尖锐了。宋文清的伤使我无比难过。

1947/ 8/ 26

宋文清送到长白去医治，下午拷问郝宏义，是群众提出的要求。他们要发泄最大的仇恨，施以火刑。我痛快极了。在这样的场面，我能有这样的心情，不能不说是党教育了我。

1947/ 8/ 27

(欢送新战士)第一次看到这样动人的场面。新战士已成了久经锻炼的队伍，早饭后整队入操场，准备好的彩布、鸡子、光荣花在台上堆满了，村长把会场加以整顿，新战士在第一排，家属在第二排，简单讲话后，响起锣鼓……嫂子们找到了她的弟弟，选了一块最鲜艳的红布给披上，青年情人们忘记了羞愧，在广大群众面前放射着离别与留恋的视线，多么甜蜜又多么有趣啊。

据辽东日报 1947 年 12 月 3 日报道：至 1947 年末，长白县有 3000 多名青壮年参军，占全县总劳动力 8117 人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占男性青壮年 5619 人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冬去春来，四保临江战役纪实，277 页)

1947/ 9/ 5

开始群众工作汇报。王平同志谈干沟子情况，证实了我上次去干沟子后的感觉是正确的。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他们第一次斗争了 11 户，内有地主亦有伪字号的中农，大致上不错。第一次斗争后有 28 户献东西，19 户是中农，这已够说明问题的严重了。但，他听了“酝酿诉苦，组织二次斗争”的意见，又斗争了十三户。自然情节没有第一批重，但搞得却比第一次更苦。据王平同志说是由于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可惜，他方向引错了。我们要求把苦集中到已扣已斗的大地主身上去，而不是硬在群众中找。假若说第二次斗争群众情绪特别高涨，那么蛮干将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第二次斗争后，又有十户献东西，中农。从干沟子的问题证明自流问题迫切需要指导。十八道沟，二十道沟，城区继续汇报。

二十道沟斗乱了。老李头讲得不明不白，听不出头绪来。十八道沟打死了四个人，如果对斗争作有计划的领导，那么这四个人都可以不打死。就死论死，至少是有两个人是死错了。假如不正视这方面的错误，就等于放弃领导，迁就了干部的缺点与偏向。城区在外村的影响下已动起来。粗略计算，已扣七十余人。如何掌握挖特斗争是大问题。

1947/ 9/ 6

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以下决议：一，坚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带伪字号者除极个别，极特殊的罪恶昭彰者可以斗，但只能搞政治，经济部分只能搞出依靠剥削欺诈出来的那一部分。一般的村长、伪职员等，要在政治上给以打击，要他们谢罪，赔不是。二，小商人稍有与伪官商有关者一律不搞，即与中小地主有关的小床小铺从此也不再搞了。人的处理，视其剥削之轻重决定交乡下或交城里。三，非人所痛恨，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恶霸兼特务者不能打死。应以全区为标准，而不能以村为单位，并在打死前必须经县讨论批准，群众则需酝酿成熟，成为有计划的行动。四，被斗地主必须在家底挖光后给留以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土地，锅，碗，破房子……一般中小地主维持贫农生活水平。对整个长白群运，现在已经是收不是放的时候。因之不仅要向群众进行政策教育，而且要把地主之大中小加以区别。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主席)

(责任编辑 致 中)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①

——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

● 吴南生

1966年6月1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次，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都很朴素，不迎送，不请客，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去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我和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当时我们以为他很快会回来，至少春节时会回来。但没有料到，他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陶铸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不到五个月，即1967年1月4日就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1月30日逝世，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他含冤去世时才61岁！

图中1毛泽东、2陶铸、3吴南生

1960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局，分担中央的一部分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分管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机关设在广州。10月我也从广东省委调到中南局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担任农办主任。这时，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中南局一成立，陶铸同志立即到河南去，解决信阳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又要我立即到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了解纠正“共产风”的情况。回来后，又决定立即在番禺大石公社建立中南局的农村工作点，开展反“共产风”和恢复自由市场等工作。我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到这里。陶铸同志也几次来这里，他是停不住的人，除了和我们一块研究工作外，就到处跑，找基层干部和农民谈话。

这时，生活很艰苦，每餐只有不见油花的萝卜、青菜，有点腐乳就很好了。这时，我的双腿也水肿了。陶铸同志身体本来就不好，还经常咳血。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用餐，要给他加点什么，

1966年，陶铸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坚决拒绝，只加点他自己带来的辣椒。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和毛主席的活动密切相关。

1960年10月23至26日，毛主席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有关农业情况的汇报和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26日毛主席收到“信阳事件”的材料，与会同志听到“信阳事件”的情况，十分震惊！

196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大、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1958年，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这时，毛主席看到“信阳事件”的报告，看到反映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震动很大！

从这时起，毛主席不吃肉了！

11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说：“发去湖北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他要求“省委一级要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从这时到1961年2月即这年的春节前，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的严重局面。1961年2月12日毛主席到广州，在这里过春节（正月初一是这年的2月15日）。之后，听取了他派出的三个调查组的报告。3月5日在珠岛宾馆三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同志参加。

会议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毛主席指定：起草工作由陶铸同志挂帅，陈伯达为副帅。

3月14日，在珠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初稿。这个文件因共有60个条例，故又称“六十条”。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写着：“毛泽东十分关切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第二天就离开广州。”

这就是中南局成立不到半年时间中所发生的情况。虽然，当时中南局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但陶铸同志从解决“信阳事件”到在大石公社蹲点，到负责起草“六十条”，都为中央改变当时严重形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六十条”下达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所以，存在的困难仍然不少。

1962年夏天，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的龙胜县做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地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很好，当即由他主持写了《龙胜座谈纪要》，准备在中南五省推广这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7月初，陶铸同志到粤东检查工作，一路上他都讲龙胜座谈纪要。到了汕头，刚好澄海县委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他在会议上又讲，非常激动：“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增产就是马列主义”。我和他的秘书都很担心，私下里说：“糟糕，又走火了！”有时候他一

激动起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第二天，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到北戴河开会。到北戴河以后，他把《龙胜座谈纪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于7月22日亲自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陶铸非常高兴，打电话到汕头，要我再补充一个公社的材料，一个大队的材料，一个小队的材料。我赶紧组织好了三个材料派人连夜送到广州，再送到北戴河。但是毛主席又改变主意了，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单干风"、"翻案风"，《龙胜座谈纪要》从此没有了下文。但陶铸同志说的"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我，我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话是他说的。

陶铸同志最光辉的还是到北京以后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日子，他在"四人帮"穷凶极恶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保护挨揪受斗的老同志。为了这，他敢于当面谴责江青。"四人帮"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件事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当然，人无完人，陶铸同志在工作中也有失误甚至错误。广东两次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陶铸同志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但我认为，他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也一定会勇于承担错误，为"反地方主义"受伤害的同志平反。

话要再说回来，陶铸同志犯错误也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分不开，其实解放后我们搞那么多运动又有多少次是对的呢？像文化大革命，真是十年浩劫啊！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体制有问题。因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讲民主，不讲法治，什么时候、任何惨剧都可以发生的。1958年3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者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②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意义所在吧！

①标题选自《陶铸诗词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句自《登庐山》，朱陈：指朱元璋和陈友谅；后句自《赠曾志》

②引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作者系广东省原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 杜 晋）

书屋 2007年第12期目录

书屋讲坛	节能减排的动力和机制	林伯强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陈彩虹
口述历史	藏北无人区湖泊科学考察散忆	范云崎 口述 温瑾 整理
流年碎影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六十年前写的《中国的儒学统治》	刘绪贻
	综贯百家 洞流索源——重读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姜 弘
域外传真	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	孙康宜
	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	夏晓虹
	在莱顿浏览高罗佩收藏的民初色情读物	吴存存
思史佚篇	重塑"贤媛"：戊戌妇女的自我建构	钱南秀
灯下随笔	创意阶层在哪里兴起？	田方萌
	菜刀上的血	肖学周
	游戏汉字为哪般？——评吴冠中的书法	李兆忠
	谁念西风独自凉——关于文学批评的随想	张宗刚
	冬日随想	李文熹
书屋品茗	检读胡适（二则）	邵 建
	"小帘灯火屡题诗"	王耀文
	人性的美感——读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	罗银胜
	服饰·民俗·传统	颜湘君
裁书刀下	说"左家情趣"——关于周作人一首《儿童杂事诗》的理解	韩立平
	身体发肤异样伤	刘彩燕
	咏絮之才，其实是庸才	毛 翰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深切缅怀黄正清同志

● 李屺阳

黄正清大革命时期已经是藏族中一位出类拔萃的英俊青年。共产党人宣侠父于1925年至1927年5月来到甘肃甘南自治州，和黄正清关系甚好，对黄正清进行启蒙教育，并对他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激发了黄正清爱共产党、爱祖国的情怀，从此黄正清为民族为祖国倾注了他的一生。

宣侠父于192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春受李大钊派遣，以国民党员身份带一批共产党员支持冯玉祥建立了抗日同盟军。10月，冯率国民革命军西征甘肃，派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驻兰州执政。宣侠父时任总政治处处长同到兰州。

1925年，军阀马骐派重兵侵占了拉卜楞寺，残酷镇压藏民的反抗斗争，先后烧毁寺院30多座，摧毁大批村落，杀害僧俗群众7000多人。为此，藏民多次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控告，但屡告屡败。年轻的黄正清亲历了马骐及其子马步芳军队血腥镇压藏民的黑暗统治，他悲愤难平，立志要为藏族父老乡亲伸张正义。黄正清和萨丹听到刘郁芬驻兰州后便来到兰州，当面向刘和宣侠父控诉马骐烧杀掠夺甘南藏民的惨痛遭遇。

宣侠父知情后，夜间来到他们的住处，给他俩讲民族平等的道理，黄正清第一次听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鲜字眼，激动得流下眼泪，因为过去一直称藏民为“番子”。在宣侠父帮助下，他连夜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印刷了很多份，贴到兰州城内各街巷，掀起舆论。

黄正清揣了一肚子悲愤要对宣侠父说，却不会说流利的汉语，也不大懂汉文。宣侠父教他汉文、汉语，同时宣侠父也要黄正清教他藏语、藏文。情谊交融，黄正清对宣侠父相见恨晚，还给宣侠父取藏名“扎西才让”(吉祥之意)。

这时，黄正清正当英年，在宣侠父的协助下，黄正清等在兰州组建了藏民第一个进步组织“藏民文化促进会”，每天除学汉文外，还跳舞、唱进步歌曲，宣侠父还介绍黄参加了国民党和少年同志会，帮助他当选为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监察委员。

同年，宣侠父为调查了解具体情况，经刘郁芬同意，穿上藏袍，和黄正清一同骑马来到甘南草原。宣侠父一路上途经村落，目睹了马骐军队烧杀过的惨景。行到阿木去乎寺宝殿，黄正清对宣侠父悲愤地说，这里曾是甘边最有名的大寺院，200多间宏大的建筑已被马骐军烧光，留下的只是眼前的残垣断壁，当时大经堂中还有一千多喇嘛正在念经，几乎都葬身于大火中，少数冲出火坑的也都被枪杀了！宣侠父听后，痛心至极。在欧拉(今玛曲)，宣侠父会见了流落在此的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五世活佛和黄的父亲黄位中。宣侠父对黄位中讲了许多团结民众的革命道理，要他团结藏民，建立充实自己的武装等等。

黄位中采纳了宣侠父的意见，部署联络400里以内各部落的大小头人，集会欧拉草原，研究成立藏民大联盟事宜。一周后，来到的除200多头人外，还有随从、护卫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在部落头人大会上，黄正清当翻译，宣侠父讲话，强调“弱小民族的自身团结，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他拔起一撮草拧起来说：“一根草不行，一撮草拧到一起，不会断，大家武装起来，十个马骐都不怕！”随后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侠父还帮助起草了《甘边藏民请愿书》，揭露封建军阀马骐在甘南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7年“四·一二”惨案发生，蒋介石叛变，国共合作分裂，下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都退出，“礼送出境”，刘郁芬把宣侠父也“礼送”了。黄正清和宣侠父惜别时紧紧拥抱，流泪不让他走，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恋恋不舍，送走宣侠父。

黄正清受到共产党员宣侠父的教育后，不仅

耳目一新，而且思想政治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日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心里揣了一条宣侠父给他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座右铭，懂得了处理民族事务的正确路线。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西北“剿总”朱绍良命令黄正清集合三个团堵击红军。黄正清已经受过宣侠父的教育，知道共产党人对藏民好，懂得民族政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没挡住红军，他去不是以卵击石吗！他拿定主意，决不派藏兵为蒋、朱送命。但马步芳却恶意报告国民党中央说，“黄正清勾结红军，图谋不轨”。后查无实据，以马步芳纯属诬陷而作罢。

抗战三年后，虽然大部分国土沦丧，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坚定不移，在全国抗战捐献活动中，黄正清组织拉卜楞致敬团，亲自任团长，带了近50人到重庆，捐献飞机30架，每架3万银元，蒋介石亲自接见致敬团，还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赵寿山、何应钦、张治中等人出席。重庆各大专院校纷纷邀请他讲话，报纸大力宣传藏民的抗日救国思想。这件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到达甘肃。黄正清心如潮涌，盼望甘南藏民早日翻身得解放。他从各方面打听到习仲勋，便化装寻找，终于见到了习仲勋。习仲勋十分喜悦。黄正清的到来，为解放军进入临夏、甘南打通了一条道路。分手时习仲勋还送了黄正清一支手枪。

不久，政委王恩茂亲笔写密信给黄正清，说明解放军将向临夏进军，要他派人到临夏洽谈和平解放夏河事宜。黄接信后即派保安副司令张子丰三人，到临夏见到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说明黄正清愿意起义接受改编的意愿，还表示愿意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等设备。王震听了很高兴，拨给黄正清一批枪支弹药，充实藏军，给黄正清回了一封密信。黄看到密信，知晓王震见面的喜讯后，号令藏军紧急集合，高呼：“藏军跟我投奔共产党，起义！”藏军藏民欢呼：“起义！起义！”那天藏军两万多人，列队四里多长，排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时，黄正清得知兰州战役中，马步芳部已基本被歼。之后，他派张子丰等人，带上给彭德怀、王震的致敬信，表示谢意，领回了拨发的枪支弹药。

黄正清到兰州后，受到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彭总说：“你率部起义，参加革命，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作出了表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后设宴招待。席间，贺老总、习、黄同坐一桌，贺总说：“你我虽初次见面，仲勋送你那支左轮手枪还是我的呢。”

彭总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们是草原的主人了，告诉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和全国被解放的人民群众一道，把我国，当然包括藏族同胞的草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这次起义，是黄正清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用他的话说，结束了他几十年来旧军人、旧官僚的生涯，得到了新生。

黄正清到了兰州，派人到欧拉接回妻子策仁娜姆。她率50多个藏民男女青年来到兰州，参加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三部（即后来的西北民族学院）学习。

策仁娜姆1916年生，从小读书识字，是藏民妇女中杰出的人才，会汉语，聪慧美丽，能歌善舞，担任过拉卜楞寺女子小学校长。1952年西北妇联派一个组参加军政委员会甘南慰问团到甘南后，策仁娜姆积极参加活动，宣传藏汉一家人，爱国家、爱共产党、爱毛主席。

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妇女代表大会上，策仁娜姆当选为西北妇联副主任。我当时是西北妇联宣传部长，从此认识了策仁娜姆。她待人谦逊，体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宽厚朴实。建国初，策仁娜姆参加了国际青年联欢会，到了奥地利维也纳，还参加过几次出国访问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大区撤消后，她担任了甘肃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为甘肃妇女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黄正清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大区撤消后任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贺龙来兰州，代中央军委授予他少将军衔，之后，黄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南州政府州长、甘南军分区司令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会上，黄正清坐在前排，经介绍后毛主席对他说：“你做了不少工作。”后来陈毅副总理任团长，黄正清任副团长，率团到西藏。陈总对黄正清说：“我们来西藏，只有你一人当翻译，在工作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正清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

从1963年起，黄正清先被批判为“搞封建复辟活动”，1966年，又给他戴上“反革命”牌子，逼交私人财产，严加批斗。之后他被押进监狱，与外界隔离。从1967年到1968年，禁闭了近两年，不准回家。1970年元月，兰州遣散人口，他和妻子被遣送到正宁县城。1972年6月，省革委会保卫部宣布黄正清被逮捕，押送天水看守所。到1977年3月，黄正清从报上看到，“四人帮”早已覆灭，天早就亮了，此时转来省法院、检察院的一张释放证。至此，他前后整整失去自由、坐了十年监狱。

1978年底，黄正清终于恢复了省政协副主席职务，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被选为甘肃省政府副省长。策仁娜姆仍然是省政协常委，恢复了名誉。黄正清要求对他1962年在甘南所谓“搞封建复辟活动”进行复查。1982年甘肃省委复查的结论是：1962年黄正清去甘南玛曲工作，是省委决定派去的，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省委都有具体指示和交代，黄正清等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解决边界纠纷任务，还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对稳定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大搞封建复辟活动”，对黄正清1963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判斗争和处理都是错误的。1978年经党中央同意，认定黄正清在甘南大搞“封建复辟活动”、定为“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均系诬蔑之词，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清除各地的诬陷影响。

黄正清为此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祖国，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毫无怨言。

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后，黄正清非常思念引他走上进步道路的宣侠父。后得知：1939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纪念“八一”活动后，骑车回家，在后宰门附近被军统特务秘密绑架，并用绳索勒死。黄正清惊悉噩耗，泪珠滚滚，悲痛不已。他说：当年如果没有宣侠父帮助他，把他引向革命道路，哪里会有今天的他呢！宣侠父是藏民的大恩人，更是他的大恩人。

黄正清还想到彭总对他的教诲，想到习仲勋给他工作上的指点鼓励。1978年，黄正清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碰见习仲勋，黄正清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互相拥抱痛哭起来。习仲勋亲切地安慰他。

1979年冬，甘肃革委会结束，成立省人民政府，黄正清再次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当时已70多岁，他要将以后不多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他多次到外省参观，给甘肃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1983年，班禅副委员长专程来到甘肃，黄和有关同志陪同班禅到夏河、合作、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碌曲等地考察。因草原放牧超载，不时出现草原纠纷，均由他出面处理。他进行实地调查，并以他崇高的威望，终于达成和平解决。

1990年策仁娜姆不幸病逝，黄副省长也于1997年10月逝世，享年95岁。他为藏民、汉民奋斗的光辉一生，广大人民群众永志不忘。

（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上接43页）逐出境。五十年代，我国开展了反对罗马教廷干涉我内政、破坏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斗争。1958年后，梵蒂冈对我作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姿态，要求同我接触。1984年和1985年梵蒂冈通过意大利政府要求与我尽快建立秘密的直接接触。我方曾答复对方，坚持要它在和台湾断交和不干涉我内政的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作为直接接触的条件。胡耀邦访意期间，梵蒂冈又通过意方向我做出答复表示原则上接受两项条件。这件事现在已过了二十年，梵蒂冈始终没有停止对我国渗透和干涉我内政的活动，看来要它做到这一条是很难的。

邓小平在听了这次西欧四国之行的汇报后说：很辛苦，访问很成功，主要是方针对头。

在总结这次访问时，胡耀邦强调（1）向中央的报告要多汇报一些欧洲的政治动向问题，提出改进和加强对外工作的建议；不要讲如何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如何成功；不要过高估计访问的作用，特别不要说成是什么“历史意义的访问”。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要过高估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胡耀邦强调，出访期间同各国谈及、承诺和达成协议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具体事项，一定要认真地检查、督促和加以落实。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杜 晋）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 刘道新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参加革命的，至离休时所参加的政治运动可谓多矣，所见所闻令人镂骨铭心、扼腕长叹。在四十年工作生涯中，我在不同岗位的顶头上司多次转换，但在十几位中竟有七位是政治运动受害者，最后走上自戕的不幸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政治运动制造的党内悲剧的缩影。

卢正义同志是1945年从延安来到解放后的大连的老干部，当时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是我的第一位革命领路人。大连受日本统治四十年，愚民教育影响很深。解放后建立了若干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教师培养和中小学生启蒙教育的任务非常繁重。为了贯彻落实党在新解放地区的教育政策，以卢正义为首的教育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创办了师范讲习所，卢正义亲自讲课。他的身体不好，工作繁忙，有时因头疼脑袋上绑了一根带子，带病坚持工作，甚至开会时还晕了过去。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教育工作的文章。经过教育局的努力，大连的中小学教育逐渐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当时一些教员提高了觉悟，纷纷投奔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我报名参军后，卢正义鼓励我到部队后好好干。他亲自到码头送行，赠送每个教员一本《整风文献》，以后还给参军的教员写信进行鼓励。他于1955年前调到国家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工作业绩显著。“文革”开始后，灾难落到他的头上。由于他年青时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虽早已做过结论，但造反派揪住不放，强加上“叛徒”罪名，后被另一派群众放走后，造反派发出“通缉令”四处追拿他。“文革”后期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但另一派经调查认为是被造反派陷害推入江中的。

我的第二位革命领路人是王阑西同志，1950年调任四野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兼任《战士报》社长。他对办好报纸抓得很紧，经常同报社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怎样办得内容充实、通俗活泼，使报纸成为指导部队建设的有力武器。当时我是记者队伍中的新兵，1949年9月衡宝战役打响前，王阑西带领我（时任新华社总分社记者）来到担负主力任务的45军135师。王阑西向我提出了具体的报道任务，并带我到达了前沿部队，开始了采访活动。我采写的一条表扬衡宝战役英雄模范的新闻，新华总社向全国播发。在王阑西任职期间，我虽然同他接触不多，但他深入部队和关心部属的好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王阑西是河南兰封县人，生于1912年，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入党，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等要职，还担任过宣传部门和党报的领导职务。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兼电影局局长、电影学院首任院长，1963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升为少将，1965年任广东省副省长。像王阑西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优秀老干部和老文化战士，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和游街凌辱，把广东省执行所谓文化教育黑线一股脑儿算在他的头上。

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 1950 年上半年于武汉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前排右起四为郑坚，右五为杨赓，右七为王阑西。后排左一为周洁夫

他最后无路可走，决心投珠江以死抗争，在江岸幸被别人阻拦得救。平反后，他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96 年在北京逝世。

新华社原四野总分社社长杨赓同志，是在政治运动中自杀的我的第三位革命领路人。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以军事记者身份，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编发各个战役的战报，发往新华总社，向全国人民宣扬东北子弟兵的辉煌胜利，揭露了蒋军的溃败丑态。熟悉杨赓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编发的战报精确简练，高效及时，多次得到总部首长的好评。他采写的一些新闻和新闻述评，也都被认为是精品。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这批新闻战线上的新兵，业务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杨赓是湖南长沙人，生于 1915 年，1938 年入党。1935 年在北大读书时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参加革命后，历任《东北日报》、《观察日报》、《新华日报》等及通讯社的领导职务。1946 年 2 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在北平创刊，任务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活动。报纸虽仅存 3 个月即遭国民党查封，但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很大，被群众誉为“明亮的和平民主灯塔”。他当时是报纸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担任采编部主任，其他成员有钱俊瑞、于光远等。他在工作中勇于挑重担，斗争中勇敢机智。国民党曾逮捕《解放》报的 41 名同志。杨赓面对白色恐怖，毫无惧色。1950 年，他从部队调到通俗读物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1957 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只因为在鸣放中对党的领导工作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便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最后被迫含冤自杀。噩耗传来，原四野总分社的老部下都感到十分震惊和困惑。

1950 年担任《战士报》副社长的周洁夫同志，是我的第四位革命领路人，在“文革”初期即被逼自戕辞世。他的不幸离去，使我五内俱焚，长时间难以承受。周洁夫是四野的知名作家，著有《走向胜利》、《祖国的障屏》等多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长诗。1947 年秋季，我参军赴哈尔滨，很快便在《东北日报》上看到他的报告文学《大炮进街》等作品。后来周洁夫调到《战士报》，成为我的上级。他勤勤恳恳，和蔼可亲，使我真正看到了延安老干部的优良作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他刚从解放军文艺社调到广州军区任文化部副部长，随即被派去参加林彪委托江青在北京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那次会议竟认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包括部队推行了一条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来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会议上杀气腾腾，毫无民主，充满着恐怖气氛。当时周洁夫十分意外、困惑，回广州后忧心忡忡，郁闷不乐，无心向上级汇报、向下级传达，甚至精神有些恍惚。

1966年8月25日，年仅49岁的军旅作家周洁夫完全绝望，坠楼身亡，被定为叛党，开除党籍、军籍。

郑坚同志是我参军后从事新闻工作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是我的第五位革命领路人。从1948年成立新华社四野总分社到进关，到平津战役，再到南下进军武汉，直至《战士报》复刊，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几年来，他对我耳提面命，热忱指导，使我逐步学会了一些新闻业务知识和实践方法。1948年我刚到四野总分社时，职务是文书，尚未任命为编辑记者。进驻北平后，我主动编写了一条反映东北籍战士要求打到江南解放全中国的新闻，他看后很高兴，立即修改发向新华总社。他让我编写的第一条新闻是反映驻北平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内容的，他看后也给予了肯定。在《战士报》工作期间，他对编辑记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注意提高新同志的政治觉悟，介绍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多次讲述在皖南事变中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及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但是，坚持原则和性格耿直的郑坚，终于没有躲过"文革"劫难。1966年8月，他在总后勤部任宣传部长时，被打成"三家村"头子和三反分子，受尽折磨凌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愤而跳楼，虽未殒命，但双手骨折造成残废。接着继续遭批斗。最后他无路可走，便决心"豁出去"，将自己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和当时"文革"形势的真实看法和盘托出，勇敢地进行最后一搏。这样便惹怒了专案组，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批斗。1969年9月，郑坚被放逐到青海贵南马场进行劳动改造，受尽了折磨。林彪摔死后，他得到平反，以后继续在总后任宣传部长。

胡痴同志是解放军报社原代总编辑，是在1967年"文革"的血雨腥风中被逼吞服安眠药片自尽，后被救活。他是我的第六位革命领路人。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军报"文革"，采用了捕风捉影和诱供逼供的手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假错案，加上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竟占干部的64%，其中作为敌我矛盾受到审查的干部占36%。当时案件最重的是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罪名是：胡痴等人进行阴谋活动，于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报社的"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的领导权。这一假案所牵连的干部达几十人，有的被送到看守所，有的被关押在牛棚，完全剥夺人身自由，不断遭到残酷批斗，有的被折磨得神经失常。胡痴被监禁自杀前，给总政萧华主任留下遗书，内称由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没有脸再见总政首长"，只有选择自尽道路。

胡痴是我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老干部，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1955年在西南军区政治部任秘书长时，调至总政治部参加创办《解放军报》，他在担任总编室主任和副总编辑时，夜以继日地同大家奋战在编辑出版第一线。他参与了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军内重大先进典型以及部队经常性建设的宣传，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平反后于2001年12月逝世。

我还要谈谈老报人于鸢天同志的遭遇。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多年担任《大众日报》的领导职务，报纸办得好，深受群众欢迎。日本投降后，他随一批老干部飘洋过海来到东北战场，参加了《自卫报》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了领导职务。《自卫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产生过很大影响，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它是《战士报》的前身。于鸢天虽然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战士报》的编辑记者对这位资深的老前辈，是很熟悉和尊敬的。"文革"前他已从总政治部的《八一杂志》社转业到辽宁省委。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在沈阳参加过学生进步活动，坐过日本监狱，虽经多年政治审查早已做出结论，但仍然被造反派残酷揪斗，最后被迫走上绝路。

我对七位革命前辈的不幸遭遇（其中三人生还），对他们以死抗争"左"倾路线的政治迫害，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他们都是在祖国危难时期最早觉悟投入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都是长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干部，却在政治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自戕，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伤天害理的不公平的结局。它是我心中永远的伤，永远的痛，永远的惑。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元曲主旋律

● 王克明

元曲好看，好看在那些开放情怀、直抒胸臆、情感细腻、幽默有趣，也好看在那些归田退隐、讽世讥俗、劝世向善、女爱男欢。不过，元曲还有一种有趣，就是那里面的一些东西，今天上点儿岁数的人会觉得非常熟悉，那就是对皇权的粉饰、歌颂、感激、忠诚。散曲里面这种东西比例不大。而杂剧作家们，在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时，经常要推导出皇恩浩荡的逻辑来。这种逻辑是皇权的需要，可以突出地用于宣教，不代表民间最广泛的声音，但能让官家自得其乐，如此就形成了元曲的主旋律，皇恩浩荡就成了元时代的最强音。

只有对巩固一个政权有利或对毁掉一个政权有力的声音，才可能被视作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元曲主旋律就是一个对皇权有利的东西。读元曲时，顺手捡录了一些这种东西，记作十个类别：一、歌颂太平盛世；二、赞颂皇上恩德；三、比拟东方日月；四、高呼万岁口号；五、敬祝圣寿无疆；六、颂祝皇权长久；七、表达感谢皇恩；八、执行最高指示；九、弘扬忠孝报国；十、雪是国家祥瑞。这里将各少举几例。放在八百年前，这些东西很正常。但是放在八百年后的当代，我们还曾亲历过这些东西，回想起来就觉得苦涩和荒诞了。

元代统治者没几个识得汉字，文化政策算是自由和宽容的。因此，元曲里有大量人性化的非主旋律内容，代表了民间最广泛的声音。最后也将少选几段，列为十一：非主旋律声音。

一、歌颂太平盛世

元代没出现过文景开元、永乐康乾，歌颂一个虚构的太平盛世，应该是官家需求。在大量率真、自然的散曲里面，出现一些这种为官家创作的作品，是皇权时代的必然。这种作品可以讨得皇上欢心，让皇上在阅读中体验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还可以帮着官家宣传当下的社会很好，不好也好。如马致远在散曲《[中吕]粉蝶儿》里写道：环海清夷，扇祥风太平朝世，赞尧仁洪福天齐。乐时丰，逢岁稔，天开祥瑞，万世皇基。股肱良庙堂之器。/ 寿星捧玉杯，王母下瑶池，乐声齐众仙来庆喜。六合清，八辅美，九五龙飞。四海升平日。

胡用和的《[中吕]粉蝶儿·题金陵景》里，强调了好风光与皇上的关系：万里翱翔，太平年四方归向，定乾坤万国来降。谷丰登，民安乐，鼓腹讴唱。读书人幸遇尧唐，五云楼九重天上。/ 东南佳丽山河壮，助千古京都气象，人稠物穰景非常，真乃是鱼龙变化之乡。山形盘踞藏龙虎，台榭崔巍落凤凰。堪崇尚，载编简累朝盛士，撼乾坤万代传扬。“读书人幸遇尧唐”一句，是表达感恩之心，说出了元曲作家不会不写这种主旋律的原因。

杂剧的宣教引导作用，强于散曲。杂剧故事使用的不一定是元代情节，但不能少了对皇权治下的溢美之词。《独角牛》：方今圣人在位，天下太平，八方宁静，黎庶安康，端的是处处楼台闻语笑，家家院落听欢声。《黄鹤楼》：俺这里风调雨顺民安乐，百姓每鼓腹讴歌贺圣朝。《渑池会》：见如今黎庶歌谣，雨顺风调，万世皇图，地厚天高。《降桑椹》：您众人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大汉朝一统疆封，万万载海晏河清。普天下军民乐业，遍乾坤黎庶安宁。反复溢美产生的客观作用，也能使人民怀疑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社会真实，努力地认为它们只是点儿黑暗面，加强皇权总是正确的意识的培养。

二、赞颂皇上恩德

在歌颂太平盛世的文字里，很多地方都提到过出现盛世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出现了那么一个皇上。因此，这个人一定要被赞颂。一些元杂剧中的语言，便是直接表达这种个人崇拜，让读者不敢怀疑这个人不同寻常的救星性质。《醉写赤壁

赋》：托赖着一人有德黎民乐，万载千秋仰圣皇。《渑池会》：岂不闻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也！《三战吕布》：一统山河帝业昌，文臣武将尽忠良。八方拜表朝金阙，万国来朝赞圣皇。

这些东西写得合适不合适，可能是作家的认识问题，而《丽春堂》里的语言，读起来就让人觉得有谄媚之嫌了：则俺那仁慈的明圣主，掌一统锦华夷，可则是平安了十万里。/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其实，这不一定是谄媚，而可能是心声。几十年前，苏联还曾把斯大林说成慈父，而我们也曾把毛主席唱作亲爱的父亲呢。

三、比拟东方日月

把圣主明君比作东方升起的太阳和黑夜指路的北斗，可能是一种皇恩意识的传统。八百年前的杂剧里就有"淡淡疮疮映晓星，海潮捧现日东升"、"恰便似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词句。

元曲采用日月同明形容皇上的非同一般和恩泽普遍。无名氏散曲《[双调]新水令》里：万万载户口增田畴辟民归善，民归善省刑罚薄税敛差徭免，差徭免日月同明，日月同明嵩岳齐肩。唱道唱道虎据中原，虎据中原龙飞九天，龙飞九天雨顺风调合天意随人愿。随人愿照百二山川，照百二山川一点金星瑞云里现。《渔樵记》杂剧里：方知是皇明日月光非遍，天恩雨露沾还浅。《岱梅香》杂剧里说在皇上身边工作是：捧持日月受皇恩，掌握经纶四十春。

使用日月星辰，是赞颂之登峰造极。这种顶峰赞颂一般用在专制社会里对皇上的溢美之词中，作为主旋律传统，曾一直延续到当代。

四、高呼"万岁"口号

在我们的体验中，高呼"万岁"的时代，是荒诞和苦涩的时代。因此，每读到元曲中的"万岁万万岁"时，总有一种幽默的感觉，怪怪的。这种幽默感产生于对荒诞的亲身体验，也产生于今天和几十年前经历的巨大差异，还产生于几十年前和八百年前的没有差异。

吴弘道散曲《[越调]斗鹌鹑》里有这样几段，段段"万岁"：天气融融，和风习习。花发南枝，冰消岸北。庆贺新春，满斟玉液。朝禁阙，施拜礼，舞蹈扬尘，山呼万岁。/官清法正古今稀，百姓安无差役。户口增添盗贼息，路不拾遗。托赖着万万岁当今帝，狼烟不起，干戈永退，齐贺凯歌回。/光禄寺琼浆玉液，尚食局御膳堂食，朝臣一发呼万岁。祝圣寿，庆官里，进金杯。

中国古代社会，皇上万岁是一种统一意识，是一种指导思想。"万岁"的观念应该起源于原始人类对长生不老的巫术崇拜。用于皇权后，它的含义跟巫术时代差不多：一，他能老活着，别人不能；二，这是因为他已超越人间，沟通天命；三，他又像是法力无边的神，别人必须敬畏；四，所以他地位极其崇高，所有人得俯首帖耳。这是中国历史中绵延不断的主旋律。元杂剧中也常见。在当时，说皇上万岁，应该是正常的、没有谄谀之嫌的，就像八百年后的人仍然曾发自真心地呼喊过"万岁"一样。

以下几处"万岁"，都是八百年前剧中人物的口语道白。这应该是摹写了当时的生活真实。《蝴蝶梦》：今日的加官赐赏，一家门望阙沾恩。（正旦同三儿拜谢科，云）万岁！万岁！万万岁！《敬德不伏老》：圣明主加官赐爵，朝帝阙拜谢皇恩。（尉）万岁！万岁！万万岁！南戏《荆钗记》：宜令钦此。谢恩！（生）万岁！万岁！万万岁！南戏《幽闺记》：军情紧急，不可稽迟。谢恩。（外）万岁！万岁！万

万岁！《幽闺记》还有：呜呼！彝伦攸序，尔宜钦哉！谢恩！《众》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真实。几十年前，我们都狂呼过这样的口号，节奏一样，一字不差。非狂呼者，也曾被迫高呼。因为这口号已成为时代最强音，成为非宗教的五体投地表现。

五、敬祝圣寿无疆

跟“万岁”表达同样意思的其他词语，文革中用过“万寿无疆”。在元代，这方面语言略丰富一点儿，可以说“万万年”，还可以说“圣寿齐天”。没留神元曲中用不用“万寿无疆”这个古老的词儿。我看到的，其形态改成了“圣寿无疆”。《丽春堂》：愿陛下圣寿无疆，顿首诚惶。唬的我手儿脚儿忙也波忙。俺如今托赖着君王，可怜我疏狂，直来到宅上，死生应难忘。《仁战吕布》里也有：端的是太平之世，愿圣寿永无疆。

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口不离“万寿无疆”，现在才知道，这个词略加改动，便可以有更丰富的含义。今天用来，“万寿”只是个寿命的时间概念，跟“无疆”的时间表述有些重复，两个搁一块儿像是个并列结构的词。而“圣寿无疆”里，“圣寿”表述的是寿命的性质，说这不是一般的寿命，然后再用“无疆”表述其时间没头儿，词中就增加了“圣上”那个具体的尊崇对象。这样已有所指了，简练许多。

六、颂祝皇权长久

皇权长久是皇上的心理期待，不一定是元曲作家们追求的理想。“万岁”喊得顺口了，情有可原。但作品中老出现祝皇权长久这种东西，便有了被迫的迹象，或是阿谀的嫌疑，使这些东西表现出了主旋律的典型性质。吴弘道《[越调]斗鹌鹑》里有：愿吾皇永坐在皇宫内，愿吾皇永掌着江山社稷。愿吾皇永穿着飞凤赭黄袍，愿吾皇永坐着万万载盘龙亢金椅。这四个愿吾皇永什么，虽然不及后世的四个伟大，但已经把皇权恭敬得无比崇高了。

大概同样是因为压力，杂剧里较普遍地宣教一种保皇意识。这东西一点儿没有现代保家卫国的意思，保的全是皇家、皇朝、皇图。皇图指的是皇上他们家的势力范围。《连环计》：愿圣主千年寿，保皇家万代基。《绳池会》：今日个文臣武将安天下，永保皇朝万万年。《五侯宴》：学成三略和六韬。忘生舍死建功劳。赤心辅弼为良将。尽忠竭力保皇朝。《衣袄车》：朝金阙躬身叩首，立乾坤帝业兴隆。今日个加官赐赏，保皇图万载升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利益远远高于百姓利益。让这种认识深入人心，惟主旋律能做到。

七、表达感谢皇恩

古代社会，百姓困苦极属平常。能有一个心眼儿好的官员救贫济困，是非正常现象，是值得百姓感恩戴德的皇恩浩荡。从来，主旋律想告诉人的，都不是百姓如何冤屈困苦，而是官员如何爱民辛苦。百姓受了冤屈委屈，能遇到个明白事理的青天大老爷给做主，必须感谢皇恩。《蝴蝶梦》：九重天飞下纸赦书来，您三下里休将招状责，一齐的望阙疾参拜。愿的圣明君千万载，更胜如枯树花开。《合汗衫》：李府尹今朝判断，拜皇恩厚地高天。

培养感恩意识，是历朝历代主旋律的要点之一。子民必须明白：皇上来统治你，是造福予你。皇上给你提供帮助，是他分外之事，是赏赐。你一定要心存感激，衷心拥戴。这个谢皇恩主旋律，可以用杂剧《陈州粜米》里的一句词儿来概括，这就是：谢圣人肯把黎民救。不是圣人应该为黎民服

务，只能是黎民应该谢圣人恩德，也就是“谢皇恩”。

元杂剧中还有一种很常用的谢皇恩情节，就是皇上给升了官，批了示，赏了钱。《敬德不伏老》：坚心主意施公正，报答皇王爵禄恩。《九世同居》：治民有法知条令，报答吾皇水土恩。《醉写赤壁赋》：今日个加官赐赏，一齐的拜谢吾皇。这种事情的描写，客观上能帮朝廷对官员进行知恩图报的教育，使尽忠竭力，安定局面。那时候，官员认真干活儿，基本不是为关心百姓，而是为报答皇恩。

八、执行最高指示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服从。《两世姻缘》：不想他班师回朝，倒将此事奏知官里，蒙圣旨招我携家回京。与他成此亲事。此系圣人天语，谁敢违背？不免入朝走一遭者。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执行。《金钱记》：〔贺知章云〕老相公，这是圣语，非同小可，不得迟慢。〔正府尹云〕既是圣人的命，且饶他罪过。张千，放他下来。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恭敬。《谢金吾》：我奉圣人的命在此，你骂了我就是骂了圣旨一般。你骂圣旨该得何罪？

我们后来不把圣旨叫圣旨了，改叫最高指示。曾经，一段儿最高指示说出来，深更半夜的，人民就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要说谁违反了最高指示，那人就成了反革命，得去遭受一番炼狱折磨。从元曲里看，元人对圣旨的基本态度只是敬仰，尚未见到八百年后的如此热情。

九、弘扬忠孝报国

忠孝报国是两千年来的主旋律。元曲里也弘扬。《裴度还带》：国家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顺孙。圣明主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家国同构，皇朝就是一个家，一个占有天下、地位崇高的家庭。这种政权性质决定，皇朝一定得以治家的道理服天下，用治家的方法治天下。弘扬孝义，就是培养忠君。今天，义、节、孝、顺都只是夫妻敬爱和敬老爱老的美德，但在古代，它们跟皇权稳定联系在一起，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意义远比现在重要和深远得多。

自古以来，由于没有能推动官员意识健康的制约力，制度只产生贪官，只趋向害民，于是凤毛麟角的清官被衬托出来，事迹得以传扬。清官行为以忠君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皇权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针对的主要是逆臣。《陈州粜米》里赞皇上赐的势剑金牌道：这剑也，到陈州怎肯干休，敢着你吃一会家生人肉。哎！看那个无知禽兽，我只待先斩了逆臣头。

皇家利益具有肯定清官的总体倾向。文学作品便总把清官行为说成是皇上派遣，推崇有加，离不开皇恩浩荡的逻辑，形成了主旋律的声音。元曲亦然。《盆儿鬼》：皆因老夫秉性正直，历任廉能，有十分为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念。谢圣恩可怜，加拜龙图阁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

看来正直是清官第一要义。然而，制度不培养正直，清官只是个人行为，不是制度行为。这种个人行为不可能超越专制制度背景而存在。清官的走红，只说明制度的黑暗。所以，讴歌清官的最好结果，撑死了也就是教育广大官员爱民如子，报效皇朝。爱民如子这句话很不好听，它把治家理念拿来治国，民永远是子，永远是被管束者，永远不会与家长——官员平等，永远不能要求人的权利。

十、雪是“国家祥瑞”

元人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儿，就是把雪叫“国家祥瑞”。杂剧较多使用。《遇上皇》：时遇冬天，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好大风雪也呵！《住金阁》：时遇上元节令，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降桑椹》：时遇盛冬天气，朔风大凛，密布彤云，纷纷扬扬下着这国家祥瑞。

把天上下雪，说成是地上国家的吉祥征兆，基本原因在于那是降水。干旱气候带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家，降水的意义非常重要。降水少了可能饥荒，饥荒重了可能流民，流民多了可能动乱，动乱大了可能危及政权。因此，从下雪体验到歌舞升平，是寄托了安定期望的。

本来，下雪这件事，直接的结果是农民受益有饭吃，是农民的祥瑞。之所以把它说成是“国家祥瑞”，从杂剧里看，不是因为国家利益跟农民利益是一致的，而是因为统治者的着眼点在于皇权稳定。像《降桑椹》里写的：众位长者，想圣人治世，普施洪恩，大行王道。见如今四夷咸伏，天下

平定，君圣臣贤，万民欢乐。时遇盛冬天气，下着国家祥瑞。于是，自然降雪被赋予了怪怪的政治意义。强调它跟浩荡皇恩的关系，强调它对于太平盛世的作用，于是，它具备了元曲主旋律的所有特征。

《合汗衫》：员外，似这般大雪，真乃是国家祥瑞也。《降桑椹》：这雪真乃国家祥瑞也。〔正末唱〕这雪普四海添吉兆，仰圣德黎民安乐。满斟白醪，贺丰年万姓歌瑶。下雪就下雪嘛，视作吉兆也没啥不好，可是，黎民安乐的原因，非得说是"圣德"不可。是圣德，就得敬仰，就得谢恩。就连下雪丰收，也得歌颂皇上。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主旋律逻辑。所以，说到底，"国家祥瑞"只是皇家祥瑞。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是丢掉了这么一个主旋律传统。

十一、非主旋律声音

元曲里，尤其是散曲，绝大部分是表达个人真实情感的。很多元曲作家了解民间疾苦，写出来的东西颇具人性，非常真实。人性的，真实的，就不是主旋律的。

《杀狗劝夫》杂剧里也有一段说"国家祥瑞"，说得透彻：有那等富汉每，他道是压瘴气，下的是国家祥瑞，怎知俺穷汉每少衣无食。我则见满天里飞磨旗，半空里下炮石，俺须是死无个葬身之地。只落得抱双肩紧把头低。我如今冒他大雪窑中去，抵多少袖得春风马上归，冻的我脚步儿难移。〔云〕嗨！那富汉每下着雪他倒欢喜，却不知俺穷汉每好苦楚也。

前引刘时中散曲《[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里，还有一段描写当时贫富差距和百姓困苦生活的：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小民好苦也么哥！那主旋律里说的"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的大好局面呢？谁都能相信"小民好苦"的社会真实，但它非得被说成是"万民乐业"。这就是不好也好。饿殍遍野的五八年大跃进，民不聊生的十年文革，也是这样。

杂剧《陈州粜米》里有老百姓骂贪官的话：你正是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图利不图名？有一首无名氏的散曲《[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内容其实也是贪官写照：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非主旋律声音代表了民间最广泛的声音，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百姓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所以它们永远打动人心。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从历史高度观察变迁中的百姓生存状况，高度凝练又能高度震撼：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躕，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你知道百姓心里有多苦吗？《窦娥冤》：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真实的、人性的东西，跟主旋律要求说的东西，差距太大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上卷（1-6期）已于2007年12月出版，每本45元（含邮费），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5年、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2007年上卷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商　户　号：111300600

收　款　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读者来信摘登

去年国庆期间，喜读李锐在《炎黄春秋》10期上亲撰的政论性文章：《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全文虽不过5000多字，然言简意深，切中要害，唤醒人们的共鸣共醒。他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畅谈对党的领导改进完美的想法。要点是三个方面：一是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要总结“文革十年”和反右运动的后果与教训；二是认为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环节；三要尊重宪法，实施宪政，首先要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这个建议，语重心长，诚心实意。它代表了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共识。资深人士认为，它立论有据、有理、有节，是驳不倒的金玉之言。给我们有莫大的鼓舞。

人们尽知，李锐青年时，因直言为民请命，被监禁、流放20多年，在他复出之后，勤奋苦读，深刻反思，写下了共600万字的回忆专著、日记、书信、杂著。2001年，他曾因参加中华诗词研讨会，来过合肥，会晤时平易近人，交谈融洽。他虽博闻强记，但手不离笔记本，他所写的文章都是：真事、真人、真心、真话。

去年，李锐90华诞时，我们几位仰慕者为他送上一副联语：直声惊四海，丹心怀万民。

吴昭谦

我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我对贵刊所刊载的文章，大多作了认真仔细阅读。因为它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也使我对许多可质疑的事物能以释然。作为一个离休干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仍永系胸怀。我对贵刊编辑同仁非常认真确切地履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的职责，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看到贵刊2007年11期刊载李凌所写《从国际排行榜说起》一文，谈一点肤浅体会。这篇文章把鲜为人知，但却是人们所关心的全球众多国家廉洁‘国际排行榜’的来龙去脉作了十分清晰的介绍，尤其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处的名序列出，无疑使人们对我国在国际上所处排行位置起着‘知情’的作用。李凌文重点对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廉洁国家排行名列前茅的原因，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介绍，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文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可谓语重心长，十分中肯，深深值得我们反思。

我对李凌这篇文章稍作补充的是：去年（2007）9月28日《参考消息》刊载了《透明国际公布‘腐败感受指数’》的报道称，透明国际于2007年9月26日公布了年度腐败感受指数，它是根据两年来专家和商业机构提供对180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该报道说：“今年并列廉洁国家榜首的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得分均为9.4分，位列其后的是新加坡、瑞典、冰岛、瑞士……在主要大国中，英国名列第12位、德国第16位、日本第17位、法国第19位、美国第20位。而中国、巴西和印度并列第72位，阿富汗、伊拉克、缅甸、索马里和苏丹这些‘困难重重’的国家仍然名列排行榜的最末几位。”

以上十分肤浅的体会及补充，不揣冒昧提出，仅供参考。

昆明读者　　周　康

我是一个从乡镇基层干部退下来的读者，订阅贵刊已有八年的时间。贵刊随着时间的前进越办越好，可以用‘与时俱进’来表达。看了贵刊，辨明了历史的真伪，增强了建设好国家的信心，每年多篇文章得到其他报刊转载。每月贵刊一到，我对所订其他书报及家庭事务都停了下来，争取一天内初读一遍，连老伴都说《炎黄春秋》是我晚年的宝贝。为了和朋友们共享、共增知识，每期还连环送给三位同志阅读。在贵杂志的吸引和我的带动下，他们在2005年就开始自订贵刊，今年又有刘文相等六位同志向邮局开了订单。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但是群众关心的腐败问题，不认真治理，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不应有的

损失。贵刊 2007 年 11 期何伟教授的《防止制度成为腐败的孵化器》一文，对问题写得透彻，建议十分鲜明，我想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

重庆读者　　龙安中

报刊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当前，我国的报刊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一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悉数尽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阅读的一报一刊是《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每当报刊到手，总是先睹为快，有所收益。

我认为贵刊办刊宗旨明确，内容名实相符，说古论今，均能以事实为依据，坦陈心迹，避免了说假说、空话、套话之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也走过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有迷途者，有失足者，也有受害者，每人经历不同、感受不同、利害不同，因而在认识上也有歧异。难得的是贵刊的许多作者，不论是革命前辈、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还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皆能摒弃个人成见，以大局为重，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因而能比较明确地摆出事实、大胆阐述个人见解，而不是在事实面前讳莫如深、淡化历史记忆，甚至美化一些极不应该美化的东西。正因如此，文章才能吸引读者、启迪后人。

建议贵刊做到好中求好，趁一些老前辈健在时，请他们为国家与民族之兴旺发达，多写点东西，为抢救历史做出新贡献。另外，与过去一样，也可以经常选登一些不同观点甚至与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文章，让读者自行鉴别，以提高认识。

我在读贵刊后写了几句打油诗，录后。顺祝撰安！

谁能直笔写春秋？指点江山论乐忧。
读罢‘炎黄’精神振，是非褒贬在心头。

四川读者　陈运炎

读贵刊 2007 年第 9 期王鹏先生的《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一文，其中“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国民党军队”云云（见 72 页倒数第 7 行），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据我所知，1941 年 5 月 7 日，敌军开始总攻后，当时负责中条山地区东段、中段和西段的第十四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第四集团军的阵地相继失守。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98 军军长、我的父亲武士敏领导的 98 军负责防守董封一线，抗击北面来犯之敌，战斗激烈，不但有足够能力阻敌深入，还歼敌甚众，战绩辉煌。然后转进敌后，同八路军一道与日军周旋于中条山。并非像日本所吹嘘的那样‘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历史就是历史，日本人的宣传不足为据。为正视听，特此致函，请查证。

北京读者　　武　铁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声望听力 网址：http://www.sw-tl.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8年第1期

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吴南生：纪念陶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白介夫：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

袁鹰：在上海遥望昆明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1>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